

## 第二章 地域文化由「東西之爭」到「南北之奪」的結構巨變

地域觀念對於中華民族人文歷史發展之影響無所不在，舉凡國族興衰，政治結構，社會組織，國土開發，經濟發展，思想變革，文學流變等等，幾乎難逃地域思維的牽連。因此，研究中國之古、今學術，地域文化的深層影響力絕對不容忽視。

永嘉之禍，晉室南遷，不僅是中國政治史上首度因為外族入侵，迫使漢人過江建立新的政治中心；同時隨著北人的大規模南徙，中原文化也迅速往南傳播，造成文化中心首度離開中原京洛。而這次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也突破了傳統東西向的地域競爭結構，取而代之的是南北文化相互較勁的新型態，並就此成為中國地域文化之爭的主要模式，而以一种潛伏的力量，無所不在且持續不斷地左右著中國人文歷史的發展。不過，這並不表示中國再也沒有東西向的地域情結。事實上，東、西分魏以後的北朝，乃至隋唐歷史幾乎就是關中與山東的衝突而與江南文化形成三足鼎峙之勢，只是此處特別側重於南北文化之爭的歷史經驗。<sup>1</sup>

本章雖旨在總覽南北朝以前周秦、兩漢、三國、兩晉的地域文化競爭史以明其衝突結構之轉變，然重點更在於凸顯三國兩晉時期是地域文化由「東西之爭」轉成「南北之奪」的關鍵，以說明南北朝文化衝突之緣起及歷史發展脈絡，並希望藉此考察揭示地域文化之爭對治亂興衰之影響。

---

<sup>1</sup> 陳佩凌指出：造就地區性衝突最主要的兩項基本要素是：文化上的差異及歷史經驗。而後者更是絕對必要，如果僅有前者仍舊無法造就真正的衝突運動。……「歷史經驗」指的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有過的被剝奪感（feelings of deprivation），即歷史發展過程中，某一群擁有特定文化的人民原先共同享有某些特定權力或自主權，但卻有外力欲將其剝奪或不公平對待，使之為了維護文化自主權而致力於衝突。參見氏著：《歐洲文化中的統一與多樣性——歐洲聯盟的意識型態與文化認同》（私立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張淑勤先生指導，1999年6月），頁56-57。

## 第一節 秦漢的地域文化之爭

秦、漢帝國是漢民族疆域形成及大一統觀念確立的重要階段，然而在此廣大疆域中卻隱含著地域與地域之間的文化衝突，政治大一統的巨觀架構下潛藏著另一股幾乎能與之相抗衡的離心力量。帝國統治者能否明察此勢，往往成爲決定國運興廢的關鍵。

### 壹、秦的興亡與東西文化之爭

漢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一直是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爲主。就算排除不論遠古時代的文化形跡，<sup>2</sup>也是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東、西兩個文化體系。夏（公元前 2070 年，定都陽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鎮）、商（公元前 1579 年，定都亳，今河南商丘北）兩代崛起於山東，周朝（公元前 1046 年，定都鎬京，今陝西西安市西）則立基山西。當時文化地理的界線雖不明顯，然亦不難釐清兩者間的文化淵源截然不同。夏、商相承形成華夏文化圈，周朝因爲發源於戎域，本質上屬戎狄文化，<sup>3</sup>因此，若採取最寬泛的意義而言，周滅商亦可說是外來文化征服華夏文化。

不過周人自古公亶父（史稱太王）由豳遷岐，落腳周原（今陝西岐山北）之後，便開始積極商化，貶革戎俗，不僅學習華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及語言習慣，更營建宮室，開荒墾地，發展農業，甚至後來古公的第三子季歷，以及季歷子昌皆曾受封爲「西伯」（意即西方諸侯之長），成爲商的諸侯國。其用心吸收夏商文化的努力，無疑爲周朝爾後繼承、發揚華夏文化預作了準備。<sup>4</sup>然而，周武滅商之

---

<sup>2</sup> 關於黃河文明在遠古時代的發展過程，可參見陳梧桐、陳名杰：《黃河傳》（高雄：宏文館圖書公司，2002 年 4 月），頁 63-115。

<sup>3</sup> 關於夏、商、周三代文化之承繼關係，可參見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24-79。

<sup>4</sup> 參見傅樂成：〈漢代的山東與山西〉，收錄於氏著：《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後，並未直接立都中夏，反倒選擇西都鎬京（即長安），回到最初發源的關中地區建立宗廟。此舉雖然對中國西邊的國土開發與文化提升具有實質效用，但是也為爾後東西地域的文化之爭埋下伏筆。

周朝建都鎬京三百餘年後，爆發犬戎之亂，導致平王被迫東遷雒邑，開啓了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公元前 770 年～前 476 年）。當時，秦國掌握契機，在關西趁勢而起。《史記·秦本紀》記載：

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而至岐。<sup>5</sup>

可見秦國獲得領地，正式入主關西，應是把握了犬戎攻殺幽王與平王東遷的雙重機緣。<sup>6</sup>秦襄公在周室遇難時，將兵抗敵，並護送平王東遷，充分展現擁護周天子的忠心，其作為與冷眼旁觀、不發一兵一卒的各方諸侯相較，形成強烈對比。周天子為表謝意，於是晉封襄公為諸侯，並許諾：一旦秦能攻逐西戎，收復被侵佔的岐豐失地，就把該地區賞賜給秦國作為封地。這樣一來，秦國不但名正言順地取得領地，也合法地取得華夏諸侯國的身分。秦襄公沒後，繼位諸君文公、寧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個個胸懷韜略，靠著武力擴張斥地漸廣，在西方形成軍事強權，也預告「西部時代」即將來臨！<sup>7</sup>

---

1981 年 6 月)，頁 67-68。

<sup>5</sup> 見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97 年 10 月），頁 179。

<sup>6</sup> 參見邱文山等著：《齊文化與先秦地域文化》第七章〈齊文化與秦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3 年 8 月），頁 713～714。

<sup>7</sup> 參見梁中效：〈秦文化與西部時代〉，《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112-116。

自宣公開始，秦國便頻頻向東探頭；穆公更是積極作為，除了充分表現對東方文化的認同，努力吸納學習周文化，<sup>8</sup>又任用百里奚、蹇叔等賢臣，意欲稱霸中原的企圖十分明顯，只是過程之中處處受制於晉國。面對東進的一再失敗、挫折，穆公終於打消爭霸中原的念頭，轉而聽用賢士由余之謀，全力向西發展，結果益國十二，開地千里，成為西戎霸主。至此東從陝西、山西交界處的黃河起，西至甘肅中部北部，都為秦國所控制，實現了局部性的統一，也再次整合關中地區華夏、戎、狄諸民族之間的文化，此對於爾後秦國能一統六合是非常關鍵的。<sup>9</sup>可惜穆公以後的兩百年間，即位諸君多半平庸而無所作為，甚至還一反當年開國列祖寬闊兼容的文化格局，對山東諸國採取閉門政策，造成秦國文化發展原地踏步，沒能跟上山東諸國的進度，以致於直到戰國中期還被山東諸國輕視為戎狄之屬，<sup>10</sup>以秦國「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因而「夷翟遇之」<sup>11</sup>。

隨著秦國的日漸壯大，東西之間的對立愈發明顯，連帶使得文化界線也愈見壁壘。戰國初期，秦國為了防禦東邊的晉國，在今河南省靈寶縣東北（舊靈寶縣西南的王塚村），修築了一道防禦工事，即大名鼎鼎的函谷關（因為秦所建，故亦稱為「秦關」），東自崤山，西至潼津，地形至為險要。酈道元《水經注》曾如此形容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嶮。」<sup>12</sup>豈知此一天嶮居然在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的兩相結合之下，成為東、西文化分野的地標，使崤山、函谷關以東（關東）的山東文化和崤山、函谷關以西（關西）的山西文化有了較為明確的分界線。<sup>13</sup>「秦關」的設置原本是為了軍事防禦，後來

---

<sup>8</sup> 參見薛瑞澤：〈試論秦對東方文化的認同〉，《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1 期（2001 年 2 月），頁 45-47。

<sup>9</sup> 參見邱文山等著：《齊文化與先秦地域文化》第七章〈齊文化與秦文化〉，頁 721。

<sup>10</sup> 參見傅樂成：〈漢代的山東與山西〉，收錄於氏著：《漢唐史論集》，頁 68。

<sup>11</sup> 見見司馬遷：《史記·秦本記》，頁 202。

<sup>12</sup> 引自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6 月），頁 316。

<sup>13</sup> 吳必虎：〈中國文化區的形成與劃分〉云：「中國文化區的形成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響，即地理環境、歷史發展以及上述兩者相結合而形成的歷史區位關係。」《學術月刊》（1996 年第 3 期），頁 11。

卻演變成文化上的分立，阻隔了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連帶將秦文化限制在函谷以西之地，幸賴後來秦獻公、孝公的勵精圖治，接連改革變法，才又吸引聚集許多優秀人才願意西進關中，輔佐秦國，終於再次突破以往固守關中的僵化思維，開始積極向東拓展勢力。

幾經努力，秦國到了呂不韋主政時期，咸陽已經超越名存實亡的齊國稷下學官，同時取代齊都臨淄成為全中國的新文化中心。呂氏趁著山東諸侯逐漸衰頹，稷下學士大批出走流離之際，把握時機邀賢納士，振興秦國文化事業，其中又以編纂思想內容涵蓋九流十家的《呂氏春秋》最具代表性。<sup>14</sup>《呂覽》的價值不只是諸子百家的智慧結晶，其意義更在顯示秦文化的高度開放，若非秦國重用各國人士，吸納各家學說，絕不可能編纂出這樣性質的一部書。事實上，許多為秦國發展做出貢獻的著名人士都不是土生土長的山西人才，如秦穆公時期的百里奚、蹇叔、由余；秦孝公時期的商鞅；秦惠王時期的張儀、司馬錯；秦昭王時期的白起、范雎；秦始皇時期的呂不韋、尉繚、王翦、李斯、蒙恬等等都是來自於四方諸國。<sup>15</sup>秦國為吸引更多優秀的外來人士投入關中富國強兵的行列，甚至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客卿制度以招攬六國賓客，為秦國爭取到更多人才的加入，奠定秦國壯大的基礎。<sup>16</sup>正是因為秦國這種兼容並蓄，接納開放的文化特質，所以才能不斷地吸收、廣納、綜合外來文化的優點，最終掃滅六國，征服關東，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可惜秦皇入主中原之後過度相信集權、功利、實用的片面文化價值觀和統治經驗，以為武力可征天下，亦可服人心，於是不再持續地虛心接受中原先進文化的洗禮，甚至還以勝利者之姿，拒斥中原文化，而欲將秦文化的價值觀念強行植入中原地區，例如：認為禮文化是中原衰落的根源，從而抵制宗法文化，改以郡

---

<sup>14</sup> 參見邱文山等著：《齊文化與先秦地域文化》第七章〈齊文化與秦文化〉，頁 736-737。

<sup>15</sup> 參見邱文山等著：《齊文化與先秦地域文化》第七章〈齊文化與秦文化〉，頁 744-745。

<sup>16</sup> 參見袁禮華：〈秦客卿制述論〉，《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 31 卷第 4 期，（2000 年 10 月），頁 107-112。

縣制入替分封制；嚴拒中原士人自由議政的傳統，禁絕私學，焚書坑儒；強化武力征討的輿論，用刑法強制剷除中原百姓的社會風俗及民間信仰；以嚴刑峻法治國，徹底否定儒家德治理念！更有甚者，秦始皇入主華夏之後，四處巡狩，顧盼自豪，刻石記功，頌秦國之威猛，斥六國之無能，又詆毀中原聖君，蔑視三皇五帝，損害中原百姓信仰的神祇，罔顧六國社會之觀感，<sup>17</sup>自招致六國遺民極大反感，遂淡化六國間原有的國家意識矛盾，轉而結盟成一種仇秦心理，於是中原文化全面反撲，致使秦朝傳璽不過二世，短短十四年間迅速覆亡。

殷鑑不遠，先秦之周已提供經營中原的成功範式。<sup>18</sup>周、秦同樣起於西戎而後入主中原，只是相對於秦朝征服六國之後的傲慢無禮，周朝能虛心調節商、周文化之衝突，尊禮中原文化，推崇上古聖功，肯定各地風俗民情，重視四方百姓觀感，因而能夠穩定政局，獲得中原人士的普遍認同，甚至贏得孔子高度評價：「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sup>19</sup>，成爲華夏文化最重要的一環。反觀秦國歷史因爲學習利用中原文化的資源而入主中原，卻又由於輕視中原文化而折鼎覆亡，其於建立新的大一統王朝之後，沈浸在大功告成的志得意滿之中，徒具大一統國家意識，卻未能放寬文化格局，甚至走上狹隘的文化意識型態，更無視中原社會心理對外來政權的反對作用，放任民怨沸騰，終至不可收拾，激發陳勝、吳廣揭竿義憤，趁勢復國的就有越、魏、齊、燕等國。<sup>20</sup>

## 貳、漢的興亡與東西文化之爭

《史記·封禪書》曰：「昔三代之居（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

---

<sup>17</sup> 參見胡克森：〈秦皇朝覆亡新論——兼談文化交流的一些理論問題〉，《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頁87-92。

<sup>18</sup> 參見胡克森：〈秦皇朝覆亡新論——兼談文化交流的一些理論問題〉，頁87-92。

<sup>19</sup> 見：《論語·八佾》，引自：《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頁28。

<sup>20</sup> 參見程遠：〈家國意識與秦的統一和速亡〉，《人文雜誌》（1996年第4期），78。

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淮。……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水曰河、沔、湫淵、江水。……霸、產、長水、灋、滂、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sup>21</sup>這段文字表面似乎只在描述帝國境內山川祭祀的問題，然實際上卻隱含著東西地域文化衝突的矛盾心理。秦朝建立以後，不僅未試圖消弭地域文化的競爭心理，還擴大彼此之間的心結與衝突，就連東、西方山岳河川的多寡排序這種枝微末節之事也斤斤計較，此例頗能突顯當時地域隔閡的嚴重性。

另外，《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小事件：「(秦始皇)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sup>22</sup>一旦知道「東郡」這個地區是秦國攻打魏國時所設置，<sup>23</sup>就不難理解此一事件背後其實潛藏著國仇家恨與地域鬱結。當此不平衡心理在六國遺民心中一再擴大，就釀成了秦漢史上慘絕人寰的「新安坑卒」事件。《史記·項羽本紀》記載：公元前 207 年，秦將章邯帥卒投降項羽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侯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

---

<sup>21</sup> 見司馬遷：《史記》，頁 1371-1374。

<sup>22</sup> 見司馬遷：《史記》，頁 259。案：熒惑，古代指火星。《史記·天官書》：「察剛氣以處熒惑」句下司馬貞索隱引春秋緯文耀鉤：「赤帝熒怒之神，為熒惑焉，位在南方，體失則罰出。」王充《論衡·變虛》：「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一般而言，「熒惑守心」在占星上的意義，多為帝王駕崩的惡兆。參見張嘉鳳、黃一農：〈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為例〉，收錄於王健文主編：《政治與權力》（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180-181。

<sup>23</sup> 《史記·秦始皇本紀》：「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頁 224。

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sup>24</sup>秦漢史學者林劍鳴認為這段記載至少說明兩個問題：「(1) 秦統治中國時，將關東六國的人民強迫至關中服役，受到關中的秦吏卒欺壓，『遇之多無狀』。可見關中、關東吏、民相互仇視的程度。(2) 至秦吏卒被關東諸侯軍所俘，關東諸侯軍對關中吏卒仍不放心，關中吏卒對關東諸侯軍將吏亦存戒心，因而發生坑秦卒二十餘萬的慘案。」<sup>25</sup>由是觀之，將來誰能調解東、西地域文化的衝突，誰就有機會成爲繼秦始皇之後的中國新共主。楚漢相爭之所以最後由漢勝出，便是因爲劉邦對待關中百姓的態度與項羽截然不同。劉邦進入咸陽之後「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進退有禮；項羽則「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殺秦諸公子宗族」<sup>26</sup>，再加上項軍先前「所過無不殘滅」<sup>27</sup>，兩相比較之後，關中父老「唯恐沛公不爲秦王」<sup>28</sup>。從民心向背就已決定將來統一天下的人會是劉邦而非項羽。後來劉邦捨棄關東而選擇立都關中，對於東、西文化意識的融合更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使中國真正鑄成爲一個整體。<sup>29</sup>劉邦以泗水亭長之姿提三尺劍取天下，奠定漢朝四百年基業，正是因爲他緩和了東西地域之間的敵意。

事實上，長安被選爲漢朝國都的過程並不順利，原因正在於地域情結作祟。公元前 202 年，漢高祖定陶即位後，本欲西都洛陽，後因隴西戍卒婁敬（後賜姓劉，故亦稱劉敬）向高祖上陳關中地勢之優越性，長安才有雀屏中選的機會：

---

<sup>24</sup> 見司馬遷：《史記》，頁 310。

<sup>25</sup> 參見林劍鳴：〈中國古代國家統一的歷史過程〉，《求是學刊》（1994 年第 3 期），頁 95。

<sup>26</sup> 參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75。

<sup>27</sup> 參見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頁 356。

<sup>28</sup> 參見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頁 362。

<sup>29</sup> 案：春秋以來，楚雖逐漸華化，但孟子猶稱楚爲南蠻。可是後來秦滅六國，卻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說，可見楚自有其不同於中原的文化傳統。自有其文化者，往往有比較強的向心力，抵抗力量也強。秦漢之際，楚、漢爭雄，雖說後來楚是失敗了，但卻促進楚文化與中原文化能夠統一於漢，而爲一個新的文化整體。參見胡秋原：〈秦漢帝國之統一及對外關係——特別是與匈奴西域之關係〉，收錄於韓復智編：《中國史論集》（中冊）（台北：茂昌圖書公司，1997 年 8 月），頁 1047-1049。

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sup>30</sup>

由於漢初群臣皆為山東人，故「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sup>31</sup>。再者，「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所以朝臣「多勸上都雒陽」<sup>32</sup>。高祖面對眾卿言之鑿鑿，定都洛陽幾成定局！幸賴張良挺身力排眾議，附和婁敬之說，這才確立長安成為帝京：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sup>33</sup>

姑且不論漢初定都關中的考量為何，一旦選定長安作為首都之後，關中的民心士氣必然受到激勵，再加上適度的移民政策，誘使包括王公大臣、巨賈名儒在內為數頗多的山東上階層人士西進關中，<sup>34</sup>連帶將山東文化一併移入山西，遂使關西與關東文化之間有了進一步整合的可能。

地域競爭是歷史的深層結構之一，其不僅表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關係，即

---

<sup>30</sup> 見司馬遷：《史記·劉敬傳》，頁 2716。

<sup>31</sup> 見司馬遷：《史記·劉敬傳》，頁 2717。

<sup>32</sup> 《史記·留侯世家》，頁 2043。

<sup>33</sup> 見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頁 2043-2044。

<sup>34</sup> 參見姜渭水：《中國建都史》（台北：和平出版社，1959 年），頁 164。又參見湯其頌：〈漢高祖西都長安論析〉，《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75。

便是同一國族共同體內部，地域衝突也常構成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而區域衝突一旦擴大，便可能導致國家四分五裂。反之，地域之間的緊張關係如能透過合作的機制，也可能成爲政治系統實現內部更新的積極力量。<sup>35</sup>漢朝建立之初，透過建都關中的象徵性意義及其高度誠意之展現，初步化解東、西「地域本位」（sectionalism）<sup>36</sup>長期以來所帶給中國的紛爭，<sup>37</sup>此後長安也成爲大多數漢人共享的政治符號，成爲凝聚、團結、認同、歸屬漢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再加上秦漢以後不斷地修築長城，促使新的文化疆界產生，這樣一來不論山東人或山西人都是長城裡的人，有著相同的文化系統及文明範式，至於關外那批虎視眈眈的匈奴人則持續不斷地威脅關內百姓的生存與發展，進而促使「漢民族」族體意識正式形成，將漢民族真正推向一個統一民族、統一國家。<sup>38</sup>

雖說漢民族內部東西文化的衝突漸趨平緩，然而因爲實際權力與實質利益的分配不夠平均，潛藏於山東和山西之間的那股深層鬱結仍不時浮現。漢初的從龍之臣都是山東人，其結交援引的對象自以同鄉爲主，因而連帶扼殺山西人參政的機會。根據傅樂成的考據：西漢丞相有籍貫可考者，從高祖到景帝時期無一不是山東人士。漢武帝在位期間的十三位丞相，也只有三人是山西人。武帝以後直至西漢末年的二十個丞相中，山東人則多達十五人。山西人士既然入相受到地域關

---

<sup>35</sup> 參見任軍鋒：《地域本位與國族認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頁9。

<sup>36</sup> 地域本位（sectionalism）或稱區域主義（regionalism），此概念是用來指稱一國領土範圍內某一部分由於地理和社會等方面的同質性，使得人們對特屬本地域的利益、理想和習慣有著明確的意識，並將之與其他地域明確區別開來。參見任軍鋒：《地域本位與國族認同》，頁3。

<sup>37</sup> 之所以說是初步化解地域之間的敵對意識，是因爲地域觀念所造成的問題無所不在，並且深入社會各個層面，不是說立都哪裡就可以完全獲得解決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東人才與山西人才的相互較勁，此係兩漢政治中的一大隱憂。參見傅樂成：〈漢代的山東與山西〉，收錄於氏著：《漢唐史論集》，頁65-79。

<sup>38</sup> 林劍鳴〈中國古代國家統一的歷史過程〉云：「從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角度考察，中國古代統一國家的成立，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除去其在春秋戰國的社會母胎中孕育時期外，自秦王朝建立、統一國家的出現到真正完成統一，應歷經三個時期：第一，秦始皇創建的秦王朝，乃是統一中國的開始，其統一仍停留在制度上的層次；第二，由秦至漢則是統一的繼續；第三，西漢王朝建立之後，才將統一推進到社會文化的深層即價值觀的統一。」收錄於：《求是學刊》（1994年第3期），頁93。

係之限制，那麼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徑就只剩從軍出將了。如此一來，山東文臣與山西武將形成漢朝兩大政治集團，而最終覆滅漢室的，正是起於山西的涼州軍閥董卓。<sup>39</sup>

事實上，當東漢選擇開國於洛陽，就註定了日後的波瀾。根據《後漢書》記載，當光武帝開始營修洛陽官室、濬繕城隍之時，就曾出現「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sup>40</sup>的現象；到了明、章時期，崔駰撰作〈反都賦序〉，仍提及「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sup>41</sup>；後來班固寫〈兩都賦〉的原因，更是基於「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sup>42</sup>。從光武帝至和帝將近七十年左右的時光，關中百姓竟然還爲了遷都洛陽耿耿於懷。而最令人詫異的是到了安、順時期，已經事隔近百年之久，張衡〈兩京賦〉居然「賦意與班固東都賦同」<sup>43</sup>。可見朝廷遷都洛陽對於關中百姓而言，一直是難以接受的集體憾痛，連帶對朝廷的向心力驟減，東西對立的氣氛也漸轉凝重。

西漢時期山東人雖然掌握絕大部分的政治資源，但至少首都設在長安，所以朝廷對山西地區的發展自然高度重視，因而兩造之間並未形成緊張關係。然而，光武中興之後，鑑於長安履遭戰禍，一時難以恢復，故擇立經濟條件較爲優渥的洛陽爲國都；加上從龍之士幾乎都是山東人士，<sup>44</sup>難免受到地域情結的影響，曹道衡曾分析光武帝遷都洛陽的直接原因：「由於他本來從南陽一帶起兵，而後來又以黃河以北的河內郡一帶做爲後方重地。這兩個地方都在函谷關以東，正處洛

---

<sup>39</sup> 參見傅樂成：〈漢代的山東與山西〉，收錄於氏著：《漢唐史論集》，頁 69-71。

<sup>40</sup> 見范曄：《後漢書·班彪》（台北：鼎文書局，1999 年 4 月），頁 1335。

<sup>41</sup> 引自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10 月），頁 441。

<sup>42</sup> 見：《文選》李善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 10 月），卷第一，頁 1。

<sup>43</sup> 見：《文選》李善注，頁 55。

<sup>44</sup> 根據朱志先、張震〈析東漢定都洛陽的原因〉一文統計，東漢開國功臣三十二位，其中只有耿弇、萬修、竇融、景丹四位是山西人，其餘皆爲山東人。該文收錄於：《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 年第 3 期），頁 96-98。

陽的南北兩方。」<sup>45</sup>東漢立都洛陽以後，山東搖身變成政治、軍事、經濟、學術、文化持續繁榮的地區，反觀山西漢族人口日益減少，匈奴、鮮卑、羌人等降人則伺機向內發展，胡人勢力日益擴大，逐漸侵入邊塞，甚至迫使漢廷必須委派重兵屯守，最後竟淪為軍事地區，外族殖民地，軍閥割據地，整個山西習染胡風。漸漸地山東人視山西人如同化外，而山西人對山東人的不滿情緒也與日遽增。<sup>46</sup>

山西的軍事力量配合山東的經濟文化，開啓了前所未有的西漢大帝國。可是到了東漢，卻因為遷都洛陽及其連鎖效應再度造成東、西地域文化之間的敵我之分，甚至造成山西文化逆向走上胡化道路，最終導致山西軍閥、漢人胡化的董卓領著他的涼州鐵騎攻進洛陽，把持朝政，而與山東諸侯爆發激烈的軍事衝突。<sup>47</sup>加上先前黨錮之禍、黃巾之亂的後遺症，帝國於是崩解，進入群雄割據的三國亂世風雲！

## 第二節 三國西晉時期的地域文化之爭

公元 220 年，曹丕篡漢，改元黃初，是為魏文帝。隔年劉備、翌年孫權相繼自立為王，正式結束東漢政權，開啓歷史上的三國時代。三國是漢末戰火的延續，西晉卻是統一新局的開始，按理應將兩個時期分開討論。但是西晉之統一，是政治表象而非實質的統一，真相則如余英時所云：「在政治分合的背後，往往文化、經濟和社會的力量在發揮作用。」<sup>48</sup>即西晉雖然在名義上結束三國紛亂，

---

<sup>45</sup> 參見氏著：〈東漢文化中心的東移及東晉南北朝南北學術文藝的差別〉，《文學遺產》（2006 年第 5 期），頁 6。

<sup>46</sup> 參見傅樂成：〈漢代的山東與山西〉，收錄於氏著：《漢唐史論集》，頁 75-76。

<sup>47</sup> 關於關東軍閥討伐董卓的情況，請參見馬植杰：《三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1 月）頁 14-19。

<sup>48</sup> 參見余英時：〈中國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動力〉，收錄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 年 9 月），頁 9。

但是卻無法解決東漢從統一走向分裂的諸多複雜因素，<sup>49</sup>尤其緊迫的是東漢末年東西文化之爭所導致的胡、羌勢力坐大；及三國分立之後新型態的地域主義作祟，<sup>50</sup>以致於西晉不過歷時三十八年就因無法抵擋這些離心力量而告終，其中江南意識覺醒所引發的南北競爭心理尤為關鍵，甚至取代了傳統東西向的地域衝突模式，成為爾後中國地域文化爭辯的主要焦點。

## 壹、江東人才崛起與江南意識覺醒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詩〉是唐人杜牧對於項羽自刎於烏江畔的評議，一句「江東子弟多才俊」的惋嘆，留予後人對於江東專出人才的刻板印象！殊不知江東人才真正嶄露頭角實際上要遲至東漢以後。

《史記·貨殖列傳》曾如此總評江南地區：「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些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sup>51</sup>《漢書·地理志》描述江南風俗時亦云：「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些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sup>52</sup>王永平認為「火耕而水耨」是說明江南生產方式的落後，生產力

---

<sup>49</sup> 據余英時的意見：有幾種離心力量是造成中國自東漢迄隋唐初四百年分裂的原因：一是匈奴、羌族不斷內徙，在北方和西北疆形成極大勢力；二是世族興起，士大夫保家之念遠重於效忠朝廷；三是思想上儒學重群體的意識開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重個體自由的老莊；四是民間文化對上層的儒教文化公開反抗，從黃巾的太平道，張角的五斗米道，以及孫恩、盧循的天師道都形成民間文化與上層文化的衝突；另外就是地方主義的互相競爭。參見余英時：〈中國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動力〉，頁 9-10。

<sup>50</sup> 民族因素亦是造成三國分立的主因之一，請參見陳金鳳、宮士剛：〈民族因素與三國鼎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頁 365-376。

<sup>51</sup> 見司馬遷：《史記》，頁 3270。案：或有學者認為司馬遷對於江南的描寫帶著關中地域本位的優越感，誇大江南的落後，但根據《史記·龜策列傳》中太史公的自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頁 3225。可見司馬遷曾親身走訪江南，其敘述具有一定的客觀性意義。

<sup>52</sup> 見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10月），頁 1666-1667。

水平低下，「不待賈而足」則表明自然經濟下的生活還無須進行商品交換，「無千金之家」顯示江南社會的發展尚不充分，無明顯的階級分化，當然也無法培育出土族豪強，至於「輕死易發」則反映出江南地域風俗野蠻，法度與禮義尚未完備。<sup>53</sup>可見江南地區雖說曾有吳、越立國於春秋之世，但是秦漢以後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似乎無法跟上中原的腳步，甚至到了東漢初年，中原人士對江南的印象依舊是「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sup>54</sup>，完全視其為化外之地。

雖說東漢初期的江南地區尚屬民智未開，但是西漢卻已經有江南人士零星入仕朝廷的例子。高敏據《史記》、《漢書》進行的統計顯示，西漢兩百三十年間出生於江南地區的入仕者及知名人士有陸賈、季布、曹丘生、季心、丁公、黥布、吳芮、朱建、伍被、嚴助、朱買臣、梅福、鄭吉、龔勝、龔舍、文翁、朱邑共十七人，而且朱建之前七人是秦末漢初因為農民起義或楚漢相爭而入仕，即真正屬於正常情況下出生於江南地區的入仕者僅有十人，<sup>55</sup>其中真正能夠御前參政的則僅有嚴助、朱買臣而已，餘皆小吏，然此二人又以文辭獲賞，並非循正常管道入仕，所以也只能算是天子私人、御用工具。<sup>56</sup>值得注意的是，嚴助、朱買臣聯袂侍從漢武帝，有同邑之誼。先是嚴助獲得武帝寵幸，進而推薦買臣；後來張湯排陷嚴助，買臣又義挺嚴助，<sup>57</sup>此中不免存在著地緣關係。

相較於西漢時期，東漢以後北上入仕的江南人士遽增，據史傳記載，一百九十多年間有名望者達到七十五人，其中更不乏位至三公、宰輔、九卿者，如鄭弘、朱儁、許荆、鍾離意、陸閔、黃昌等人，至於地方郡守、刺史、縣令、州郡僚佐，

---

<sup>53</sup> 參見氏著：《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頁11。

<sup>54</sup> 見范曄：《後漢書·宋均傳》，頁1412。

<sup>55</sup> 參見氏著：〈從東漢時期入仕者與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佈狀況看東漢江南經濟的發展〉，《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3期（2003年5月），頁15-18。

<sup>56</sup> 關於西漢時期南士北上的發展情形，可參見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頁2-12。

<sup>57</sup> 班固《漢書·朱買臣傳》：「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又：「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常欲死之。」，頁2791、2794。

人物眾多，不勝枚舉。<sup>58</sup>另外，江南也開始出現一些思想家、學問家，如王充、趙曄、包咸、鬪澤、韓說、虞翻、賀純等等，這批江南文士亦因學藝精湛而延譽北方，甚至成為全國性的知名學人。<sup>59</sup>與江南文士崛起相應而生的即是地方觀念的覺醒，具體實例是《越絕書》、《吳越春秋》這兩部帶有濃厚地域性質的作品出現。

《越絕書》是一部極具議題的書，不僅內容性質頗有爭議，就連書名、作者和成書年代都極具話題性。就該書的內容及性質而言，有學者主張其為郡書之一種，乃方志源流之一，但比較客觀的說法是《越絕書》只能算是一部地方史，而非地方志。<sup>60</sup>

至於書名《越絕》<sup>61</sup>之「絕」字，其義亦是眾說紛紜。許多學者曾為此做過解釋，倉修良認為比較讓人信服的是晚清學者俞樾在《曲園雜纂》中的說法：「愚謂此絕字即絕筆獲麟之絕。下云：『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唇之與齒，表之與裡。』是以此書為繼《春秋》而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年，吳越之事，略而未詳，此書踵而成之，直至句踐之霸而絕，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sup>62</sup>另外張尙芬從語言學的觀點提出新解，以「絕」為記錄、記載之義。「越絕」是上古越語hwad-dzod的譯音，《越絕》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同為一類，是越國史記的專名。「越絕書」是音譯、

---

<sup>58</sup> 請參見高敏：〈從東漢時期入仕者與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佈狀況看東漢江南經濟的發展〉，頁 15-18。

<sup>59</sup> 參見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頁 16-19。

<sup>60</sup> 浙江的史地學界普遍將《越絕書》當作該地最早的一部方志，甚至視該書為方志學鼻祖。但研究《越絕書》的專家倉修良教授對此說法嚴詞反駁，兩度為文匡正陳說，認為該書只是一部地方史。參見氏著：〈越絕書散論〉，《史學研究史》（1998 年第 1 期），頁 31-38。〈《越絕書》浙江兩省共有的文化遺產——兼論《越絕書》的成書年代、作者及性質〉，《江蘇地方志》（2006 年第 4 期），頁 22-26。

<sup>61</sup> 《越絕書》原題為《越絕》，流傳到南北朝時，或作《越絕書》，《新舊唐書》均著錄為《越絕書》，而後代沿用之。關於《越絕書》在歷朝歷代的稱呼，請參見王志邦：〈《越絕書》再認識〉，《中國地方志》（2005 年第 12 期），頁 39-43。

<sup>62</sup> 參見倉修良：〈越絕書散論〉，頁 38。

意譯疊加，它既保留了越人史記本色，又體現了越國故地人們維護當地傳統的鄉土感情。<sup>63</sup>總之，《越絕書》就本質而言其實是地方意識覺醒的產物。

而關於《越絕書》之作者及成書年代的問題，自唐代中葉司馬貞對子貢提出質疑以後，歷來未有定論，莫衷一是！或仍堅持子貢所撰；或說伍子胥；或疑戰國後人所為，漢人附益而定；或斬釘截鐵指明東漢人袁康、吳平所著；甚至還有認為是六朝人士所作！大抵而言，自明代學者楊慎用析隱語的方式認定《越絕書》的作者為漢代人士袁康、吳平，而後《四庫全書總目》承其說：「《越絕書》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吳地傳》稱勾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後漢初人也。書末敘外傳記以廋詞，隱其姓名，其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是會稽人也。又云：『文詞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是『吳』字也；『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則此書為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也。」<sup>64</sup>這種說法幾乎成為主流。不過，仍有不少學者態度保留，如錢培明、徐益藩、余嘉錫、陳橋驛等人即認為宋代目錄學家陳振孫所持「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的意見是比較穩當的說法。而倉修良〈袁康、吳平是歷史人物嗎？——論《越絕書》的作者〉一文從考證、從文字、從傳記著手，指出袁康、吳平純屬子虛無有，完全是楊慎嚮壁虛造，因此他贊同陳振孫一脈而下的觀點，即《越絕書》非一人一時之作。厥後，李步嘉《〈越絕書〉研究》直接以隱語為中心展開討論，其研究成果與倉修良殊途同歸，認為袁康、吳平並非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而是政治隱語。<sup>65</sup>

---

<sup>63</sup> 關於張尙芬之說係參考自王志邦〈《越絕書》再認識〉一文，文中說張氏之見解將收錄在即將刊行的《浙江通史·秦漢六朝卷》，然至今仍未見刊，故暫轉引自王志邦：〈《越絕書》再認識〉，頁 39。

<sup>64</sup> 見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卷六六史部二二載記類、載記類存目（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頁 583。

<sup>65</sup> 參見張仲清：〈《越絕書》作者考辨〉，《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2005 年 8 月），頁 5-14。

就《越絕書》的內容觀之，是書出入史地之間，對政治、經濟、軍事、天文、地理、曆法、語言等多有所涉，十分龐雜；就文體觀之，文風多所差異，未見統一風貌。故《越絕書》殆非一人一時之作，乃戰國後人所為，且經吳越諸賢附益而定的說法較為中肯。

相較於《越絕書》，《吳越春秋》的問題就單純多了。其作者是東漢會稽山陰人趙曄，《後漢書》有傳。<sup>66</sup>《吳越春秋》的寫作大抵以《左傳》、《國語》、《史記》所記吳越事為所本，但所記之吳越史事又遠比諸書詳備，而與《越絕書》互有詳略。其記述內容之所以能夠在上述諸史之外又有補充，學界大多同意徐天祐《吳越春秋序》所言：「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記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sup>67</sup>即趙曄本身是越人，而東漢距離春秋戰國不至於太遠，當地仍會有許多軼聞逸事、傳說故舊可以蒐羅。

《吳越春秋》因為是地方史著作，所以能夠專心致力於吳越興衰的敘述，是以可補正史之不詳；又由於是個人專著，所以編纂體例完備，吸收編年、國別、記傳之長，在撿擇之間別開一格，創新體例，也獲得後代治史家的肯定與讚揚。<sup>68</sup>不過其中最耐人尋味之處，莫過於書中體例居然有內、外傳之別，並且還是「內吳而外越」，這也造成歷代學者的疑惑，如徐天祐作注便曾極不解地提出疑問：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句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況曄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sup>69</sup>

---

<sup>66</sup> 《後漢書·儒林列傳》：「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頁 2575。

<sup>67</sup> 引自喬云峰：〈論《吳越春秋》的史學價值〉，《懷化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2 期（2007 年 2 月），頁 42。

<sup>68</sup> 參見許殿才：〈《吳越春秋》說略〉，《史學史研究》總 125 期（2007 年第 1 期），頁 18-23。又喬云峰：〈論《吳越春秋》的史學價值〉，頁 42。

<sup>69</sup> 見【漢】趙曄撰·【元】徐天祐音注：《吳越春秋》（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 11 月），頁 28。

明代學者錢福《重刊吳越春秋序》亦有此疑惑：

《吳越春秋》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sup>70</sup>

金其楨則從趙曄生處的歷史環境及其學識背景考量，指出趙曄之所以「內吳而外越」乃在於他曾師事東漢經學家杜撫二十年，是以在思想上、學識上受到儒家的長期薰陶，云：

趙曄由於受長期形成的儒家立場和觀點支配，在撰寫《吳越春秋》時，顯然並不是站在自己是「越人」這一鄉土、地域立場上來看待吳、越和考慮問題的，而主要是從以周室為正統的這一儒家觀點來看待吳、越和考慮問題的。……趙曄生活在東漢初期，離董仲舒時代相去不遠，正是儒學鼎盛時期。可以斷言，在儒學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當時，作為一個儒家學說忠實信奉者、遵循者、繼承者和維護者的趙曄，他編著《吳越春秋》即使有「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的意圖，但在事關維護封建正統的大節上，他是決不會，也不敢為了「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公然冒天下之大不諱，明目張膽地違背儒家學說的正統觀念，擅自將非周室的「越」與正宗周室後裔「吳」相提並論的，更不會、也不敢因為自己是「越人」，而擅自將「吳」和「越」兩者的「內」、「外」位置顛倒過來，將「越」稱為「內」，將吳」稱為「外」的。<sup>71</sup>

許殿才亦云：

---

<sup>70</sup> 引自金其楨：〈試解《吳越春秋》的「不可曉」之謎〉，《史學月刊》（2006年第6期），頁43。

<sup>71</sup> 見金其楨：〈試解《吳越春秋》的「不可曉」之謎〉，頁44。

這種內外傳的方式與解經的內外傳不同，只是主從關係的一個安排，而不是內容體例的全面區別。書以吳為內傳，以越為外傳。吳越相爭以越滅吳並其地為結局，且趙曄本身是越地之人，所以明代錢福感到不可理解：「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趙曄這樣安排肯定有自己的考慮。從世系上說吳傳自太伯，尊吳即尊周，而尊周是孔子以來的儒家傳統。從重德角度上說，太伯是儒家德行的典範，孔子對太伯推崇備至，稱：「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從歷史發展過程說，吳以禮義化蠻夷有特殊意義，這種文化改造合於儒家政治思想，也合於大一統國家發展要求。趙曄這種安排與司馬遷〈吳太伯世家〉居於世家之首，內心款曲是互通的。從中國文化精神的深層內涵與中華文明發展的歷程看，尊吳其實也就是尊趙，趙曄的安排十分聰明。<sup>72</sup>

從趙曄生平著手進行思考，將「內吳而外越」歸於儒家思想的影響，此說言之成理。秦漢帝國的統一，雖說奠定中國疆域的基本輪廓，並確立漢民族政治大一統觀念，然卻未能真正拆除地域文化之間的隔膜，位於邊鄙包括吳、越在內的許多地域文化長期受中原文化輕蔑與不平等對待，終於不堪壓迫而展開反撲，類似《越絕書》、《吳越春秋》這種具有地方意識的作品相繼而生。可貴的是《吳越春秋》雖為越人所撰，而吳越爭霸的終局又是越國復仇成功，但是寫作編排的過程卻能在盛誇鄉賢，矜其故國的同時，又尊重歷史發展的事實，內吳而外越，擺脫成王敗寇的歷史觀點。相信作者煞費苦心地區分內、外傳當有其信念存焉，否則只要在編傳上一視同仁即可，又何苦強分內、外？尤其當《吳越春秋》以句踐「復仇」為最大主題，卻又不「內越」，更是凸顯作者之匠心。猜想其中可能蘊藏著趙曄對於歷史及異地文化的尊重，故能以開闊的胸襟暢談吳越爭霸史，不僅使越人讀

---

<sup>72</sup> 見許殿才：〈《吳越春秋》說略〉，頁 21。

了能凝聚鄉土認同感，也避免吳人讀了有受屈辱的感覺。

值得一提的是，自東漢至唐朝，以《吳越春秋》為名的著作居然不下於六、七種，計有趙曄《吳越春秋》，趙岐《吳越春秋》，張遐《吳越春秋外記》，無名氏《吳越春秋》、《吳越春秋次錄》，楊方《吳越春秋削繁》，皇甫遵《吳越春秋》、《吳越春秋外傳》，其中趙曄、楊方、皇甫遵以及後來的刊印者汪綱、音注者徐天祐等人又有一個共同特徵，即他們不是處於新舊朝交替的敏感時刻，就是遭遇外族入侵之際，<sup>73</sup>此間是否存在著「復仇」心理？頗耐人尋味。

《吳越春秋》與《越絕書》這兩部「復仇書」相互表裡，一是私家著述而成，一是先後增益而成，私家著述表現了個體意識的自覺，眾人附益則顯示群體意識的覺醒。而根據清人姚振宗《後漢藝文志》的統計，東漢時期江南人士的著作多達三十幾種，<sup>74</sup>亦即江南有識之士開始大量湧現。當江南意識形成之後，江東人士開始不耐煩於被中原人士視為卑薄之地的卑薄之民，不服輸也不願輸的地域文化競爭心理漸趨強烈。最經典的例子是漢末孫策曾向虞翻說：「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sup>75</sup>孫策對於昔日與北士口角落敗的這樣一件芝麻小事居然耿耿於懷，一心想要討回顏面，這也突顯出江南意識至此已經非常強烈，他們再也無法接受北人的頤指氣使。

## 貳、三國鼎立與江東人才的卓越演出

自董卓壯馬馳驅兩京，王綱解紐之後，群雄蜂駭，戰火燎原，以致於中國北方田土荒蕪，人口減少，百里無炊，陷入空前的混亂局面。此時的江南、巴蜀因為地理上有長江之險及崇山之阻，未直接捲入戰事而倖免淪為戰區，故能穩健地

---

<sup>73</sup> 參見羅俊華：《《吳越春秋》研究》（武漢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孫東臨先生指導，2004年5月），頁2、50。

<sup>74</sup> 參見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頁16。

<sup>75</sup> 參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引《江表傳》（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5月），頁1318。

發展政經。當中原遭受破壞，日漸蕭條之際，默默開發的江南地區便顯得十分耀眼，不斷地吸引北方人士僑寓避禍，為江南注入新的生產力，使之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經濟體系。加上是時江南地區文武人才並蒂開花，強宗大族財豐巨萬，於是發展出足以頡頏中原的江南社會，也為孫吳建國與江南開發奠定絕佳的基礎。反觀中原地區因為元氣大傷，一時無法復原，遂使後來統一北方的曹魏政權不得不暫時把統治重心由黃河流域移至淮河流域，中原之貧瘠可見一斑。

三國爭霸使得江東人才全面躍登歷史舞台，站到南北爭奪的浪頭上，舉凡孫堅、孫策、周瑜、魯肅、孫權、陸遜、顧雍、虞翻、步騭、呂岱、陸績、朱桓、全琮、賀齊、陸凱、闞澤、朱治、張溫等等，無一不是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或傑出的文武幹才；甚至北方著名人士張昭、呂蒙、黃蓋、程普、嚴畯等人竟慕名投入孫吳幕府，成為江東政權的骨幹之臣，此在中國人才發展史上實屬罕見。<sup>76</sup>另外，劉備集團對荊州人才的倚重，如諸葛亮、龐統、魏延、馬良、馬謖、董和、楊儀、法正、李恢、蔣琬、費禕、李岩，也建立了盤據西南的蜀漢政權。三國江南人才的大量湧現亦決定爾後歷史發展趨勢將是南北地域文化的角力對抗。

三國江東人才濟濟，眾所周知，當無須贅述，以下僅簡單列舉一系列三個南北交鋒的外交實例，說明江東人才的向心力及其面對北人的雍容自信，藉以凸顯江南意識的日漸強烈。

第一例是「趙咨和魏」。整個事件起因於蜀漢舉兵向吳，欲報關羽麥城被殺之仇。當時孫吳除了嚴陣防禦之外，又恐曹魏趁火打劫，於是決計韜晦待時，暫與曹魏通好，於是派遣趙咨使魏。《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與《裴注》引《吳書》分別記載：

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

---

<sup>76</sup> 參見葉哲明：〈三國鼎立和江南人才崛起及其盛衰之評析〉，《台州師專學報》第 18 卷第 4 期（1996 年 8 月），頁 44-67。

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答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魏]人敬異。<sup>77</sup>

趙咨使魏，旨在議和結盟，言談之間當以迎合魏文帝曹丕為佳，但面對曹丕屢次傲慢無禮的詰問，趙咨居然能夠不卑不亢地應答，甚至還反唇相譏：先以于禁兵敗被擒轉投東吳一事羞辱曹魏；後又嘲諷曹丕不事經國之業而專司尋章摘句。趙咨說到興頭上，更索性誇大江東人才如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即便曹魏企圖對東吳不利，東吳亦已備有萬全之策。數問數答之間，除了助長東吳國威之外，更取得外交場合的勝利，最終贏得北方人士的敬重。相信若非江東人才對於江東文化已有充分自信，就算趙咨如何「聰明特達」，也難以在此場面下侃侃談論而絲毫不顯侷促。

第二例是「沈珩卻魏」。趙咨的出使成功，雖使吳、魏雙方締結友好盟約，但魏文帝仍包藏禍心，以策封孫登為由令孫權送子北上，意圖挾持孫登到魏國當人質，以親情箝制孫權，脅迫東吳。孫權識破了曹丕的伎倆，於是「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並獻方物，立登為太子」<sup>78</sup>。《裴注》引《吳書》記載沈珩奉使曹魏事如下：

<sup>77</sup> 見陳壽：《三國志》，頁 1123-1124。

<sup>78</sup> 見陳壽：《三國志》，頁 1123。

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sup>79</sup>

果不其然，沈珩乍至魏都，曹丕立即當面質問：「吳國是不是怕我魏國南下？」沈珩不假思索，隨口應答：「不怕！」並機巧地解釋無所畏懼的原因，既不得罪曹丕，亦未損及國威，巧言善道地解決了孫登入魏的問題。沈珩之所以能夠隨機應變，無所屈服，贏得曹丕的好感，相信除了個人敏達之外，背後自有其江東才俊的自信心。

第三例是「馮熙死節」。是時三國情勢隨著劉備薨死白帝城而有了變化，吳、蜀雙方經過深思之後，皆有重修舊誼的意願。孫權當初事魏本非真心，正如史書所云：「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sup>80</sup>，當然不會錯此良機而積極主動地派遣馮熙至蜀弔唁劉備之喪，隨後又使之出使曹魏。最耐人尋味的是，最終為吳國死節的使臣馮熙，其實是位北方人士！《裴注》引《吳書》之記載如下：

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脩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旂巴蜀，而聞復遣脩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

<sup>79</sup> 見陳壽：《三國志》，頁 1124。

<sup>80</sup> 見陳壽：《三國志》，頁 1125。

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教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sup>81</sup>

江南的開發到東漢末年已達一定水平，甚至成爲當時有識之士眼中沃野萬里的樂土。猶如《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引《吳書》記載當年魯肅分析江南地利可圖大業的一席話：「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sup>82</sup>因此，當曹丕問起馮熙吳國的現況，調侃譏刺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凋損時，馮熙可以洋洋自滿地反駁曹丕，盛誇吳國的經濟實力與君臣之義。馮熙所云雖不免於外交辭令之誇大，然亦非信口無憑。吳國境內河川密佈，水利農田遠勝中原地區，是以向來倉儲盈滿，且《水經注》載：「孫皓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胡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漸水）<sup>83</sup>，又「諸葛恪帥師作東興堤以遏巢湖，傍山築城。」（沔水）<sup>84</sup>可見吳國不僅長期整治水利，也著重山地開發與圍田興建。若借用葛洪在《抱朴子·吳失篇》中的描述，吳國境內可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sup>85</sup>。而原欲抵禦曹魏，強化水軍所興起的製船工業，更是帶動吳國海上貿易的發達，發展出許多經濟型都市，如建康、三吳、會稽、番禺、荆襄、壽春、豫章等等，民生經濟可謂前所未有的榮景！<sup>86</sup>難

<sup>81</sup> 見陳壽：《三國志》，頁 1130-1131。

<sup>82</sup> 見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67。

<sup>83</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頁 3302。

<sup>84</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427。

<sup>85</sup> 引自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頁 145。

<sup>86</sup> 參見高敏主編：《中國經濟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8月），頁 28-58。

怪葛洪《抱朴子·吳失篇》曾如此形容吳國富賈生活：「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sup>87</sup>甚至以抑吳、蜀，揚魏都為寫作題旨的左思〈三都賦〉，都曾無意間對江南留下物庶民豐的詠歎：「樂只衍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擢轉轂，昧旦永日。開市朝而並納，橫闌闌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塵，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坐。紵衣絺服，雜沓從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sup>88</sup>至於江東人才濟濟是不爭的事實，何來人物凋損之說？自東漢以來，江南經濟條件優渥，學習文化知識者大大提升，<sup>89</sup>故文教事業與時俱進，知識分子與日遽增。漢末失御，大量學者避禍吳地，如張昭、諸葛瑾、張紘、嚴畯、程秉、薛綜等均為當地注入新血，刺激學術的發展。孫權即位後，雖尚未設置五經博士，然亦昭立都講祭酒以教諸子，培育人才，此殆為東南有國學之始。<sup>90</sup>因此，三國江東雖說仍未若北方多士，然就整體素質水平而言，倒也毫不遜於中原地區，誠如《抱朴子·審舉篇》所云：「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sup>91</sup>吳、蜀重修舊盟之後，曹丕親臨廣陵，隔江遠眺江東，曾慨然嘆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sup>92</sup>

東吳使臣，人才難得。趙德度、沈仲山、馮子柔，但見個個學識飽滿，口才辯給，臨難不屈，進退中繩，從容不迫於南北交聘的場合上，阻擋化解曹魏南侵之野心，不僅在當時有功於國家；對於今日二十一世紀之國際外交事務，也仍然

---

<sup>87</sup> 引自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頁 148-149。

<sup>88</sup> 見：《文選》李善注，頁 126。

<sup>89</sup> 參見高敏：〈從東漢時期入仕者與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佈狀況看東漢江南經濟的發展〉，頁 47。

<sup>90</sup> 參見汪惠敏：《三國時代之經學研究》（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 4 月），頁 37。又關於孫吳之學校制度，可參見王永平：〈孫吳學術文化風尚考論〉，收錄於氏著：《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338-374。

<sup>91</sup> 引自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頁 411。

<sup>92</sup> 見陳壽：《三國志》，頁 1131。

具有高度的啓發意義。

### 參、三分歸晉的歷史假象與南北地域衝突的激化<sup>93</sup>

自漢靈帝中平元年（184）爆發黃巾之亂以後，中國陷入近百年分裂，其間歷經「董卓之亂」、「群雄割據」、「三國分立」等重要階段。近半個世紀的魏、蜀、吳對峙雖使國土一分爲三，但是卻爲巴蜀、江南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從而與中原王朝區別出極爲不同的社會心理與思想觀念，並就此將中國劃分爲三個不同的文化地理區域。因此，雖說後來司馬氏崛起，先篡魏而後滅蜀（263）、滅吳（280），使中國版圖復歸一統，但是這種倚恃軍事力量的征服，充其量只能使三國歷史短暫休兵，而無法從文化上造就堅實的統一結構。

三國分立對於爾後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影響極其複雜且深刻，尤其地域情結的作用力量幾乎決定了從此中國領土分裂的基本模式。此作用力將一再圍繞中原、江南、巴蜀這三大地理文化區域，所以一旦中原失御，江南、巴蜀很快地就會脫離中央政府的統轄，最具體的實例就是趁著八王之亂割據江東的「陳敏之亂」，以及十六國時期的巴蜀「成漢政權」。

事實上，晉廷對地方上強大的反動力量並非一無所感，尤其統一之初，江南地區「竊發爲亂者日繼」<sup>94</sup>，「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sup>95</sup>，晉廷根本絲毫不敢懈怠，統治吳地實乃晉廷「時之至患」<sup>96</sup>。《晉書·華譚傳》記載太康年間刺史嵇紹向晉武帝舉薦華譚入洛，晉武帝就曾以蜀、吳之民之比較爲題，策問華譚「江表難附」的解決之道：

---

<sup>93</sup> 以「三分歸晉」爲「歷史假象」，係承自王師文進之說，請參師著：〈三分歸晉前後的文化宣言——從左思〈三都賦〉談南北文化之爭〉，《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5年12月）。收錄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台北：里仁書局，2008年6月）。

<sup>94</sup> 見房玄齡：《晉書·五行志》，頁844。

<sup>95</sup> 見房玄齡：《晉書·劉頌傳》，頁1294。

<sup>96</sup> 見房玄齡：《晉書·劉頌傳》，頁1294。

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趙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靖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俗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sup>97</sup>

陳寅恪對於這段文獻記載有極為精闢的分析：「吳、蜀之人對於洛陽統治政權態度不同，雖與被征服時間之長短有關，然非其主因，其主因在兩國統治者之階級性各殊所致。蜀漢與曹魏固是死敵，但曹操出身寒族，以法術為治。劉備雖自云漢之宗室，然淵源既遠，不能紀其世數，與漢之光武迥異，實亦等於寒族。諸葛亮為諸葛豐之後，乃亦家世相傳之法家，故兩國施政之道正復相同。蜀亡以後，西晉政亂，洛陽政府失去統治權，然終能恢復獨立者非蜀漢舊境內之漢人，而是自漢中北徙，乘機南返之巴賈部落，蓋蜀漢境內無強宗大族之漢人組織，地方反抗勢力薄弱，洛陽征服者易於統治，此晉武帝所謂『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者是也。吳之情勢則大不然，孫氏之建國乃由江淮地域之強宗大族因漢末之擾亂，擁戴江東地域具有戰鬪力之豪族，即當時不以文化見稱之次等士族孫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組織之政權。故其政治社會之勢力全操於地方豪族之手，西晉滅吳以後，此種地方勢力並未因之消滅，所以能反抗洛陽之統治，而與蜀亡後之情勢不同也。」<sup>98</sup>藉此分析亦可知為何晉武帝會對吳地的情況感到憂慮，而華譚又

<sup>97</sup> 見房玄齡：《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95年6月），頁1450。

<sup>98</sup> 見氏著：〈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錄於《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6月），頁56-57。關於魏、蜀、吳三國統治者的社會階級問題，另可參見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一篇〈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附論吳、蜀）〉（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11月），頁1-33。

爲何會勸晉廷應以籠絡吳地之統治階級爲緩靖之計。然而，當時大多數的北人顯然無法真正體認地方主義潛伏的強勁力道，因而始終沈浸在西吞巴蜀、南併江東的大一統功業，以致於對南方人士的態度一直顯得傲慢無禮。如華譚初舉秀才之際，身爲皇親國戚的洛陽博士王濟就曾當眾嘲笑他是亡國之民，有何才華？《晉書·華譚傳》之記載如下：

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眾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懦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sup>99</sup>

但見華譚舉重若輕，議論英爽，其話鋒之精銳，不僅以明珠文貝、夜光之璞自高身價，並上看歷史反唇相譏王濟等洛陽人士爲頑民之後裔！其實王濟的心態不只是其個人心態而已，應該說是北人普遍的群體心態。早在晉室尙未滅吳之前，左思就已經沈迷於大一統的幻象中，欣喜痴迷地寫下〈三都賦〉，<sup>100</sup>文中不僅充斥

<sup>99</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 1452。

<sup>100</sup> 〈三都賦〉的寫作年代一直是學術界的公案，歷來說法有以下幾種：（一）傅璇琮認爲成於太康元年（280）之前；（二）李常之認爲成於 280~282 之間；（三）高桂惠認爲成於 272~282 之間；（四）牟世金、徐傳武認爲成於 295 年左右；（五）陸侃如則繫之於左思晚年。（六）楊合林站在傅氏的研究基礎上，配合晉初朝議對於伐吳與否的爭執課題，推演出〈三都賦〉可能是一篇力主伐吳的文宣品。楊氏指出〈吳都賦〉中東吳王孫曾對西蜀公子直揭其陋，進而將吳、蜀相較指出兩國不得同論，非唯「大小相絕」，實乃「否泰相背」，顯非亡國者所得誇言。而魏國先生則認爲吳雖未亡，然亦將重蹈國蜀覆轍。（七）王師文進同意楊氏之說，並從〈吳都賦〉文本發掘內證，認爲東吳王孫動輒與中原爭勝的情況確實不像亡國之民的表现，如談吳地草木種類之繁盛則云「中州所羨」；論吳地則地靈人傑，「中夏比焉，畢世而罕見」；更云「茲都（吳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積」。參見王師文進：〈三分歸晉前後的文化宣言——從左思〈三都賦〉談南北文

著北方文化霸權；對於南方文化更是鄙薄蔑視，進而加遽北方人士對南方風土民情的刻板印象，<sup>101</sup>更確立自身的族群優越感。以下兩則記載很能反映北人的這種心態。《世說新語·惑溺篇》：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sup>102</sup>

另外則是《晉書·陸機傳》：

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sup>103</sup>

對讀這兩則記載，一是北方妻子對南方丈夫孫秀無禮，稱其為「貉子」；一是北方僚屬對南方長官陸機不敬，呼其為「貉奴」。這兩則事件中的北方人士之所以會以輕慢的語詞稱呼南方尊長，實來自於北方社會長期以來自我膨脹的文化優越

---

化之爭》，《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頁32。收錄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

<sup>101</sup> 左思〈三都賦〉毫不留情地對蜀、吳二都極盡貶抑之能事，茲援引一段為證：「推惟庸蜀與鵠鶴同窠，句吳與龜鼃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山阜猥積而踳嶇，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濺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穢。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燄暑，封疆障癘。蔡莽螫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徙裂。宵貌叢陋，稟質蓬脆。巷無杼首，里罕耆耄。或魑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壑果為嬖，人物以戕害為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揆既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引自：《文選》李善注，頁170-172。

<sup>102</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93年10月），頁920。

<sup>103</sup> 見房玄齡：《晉書·陸機傳》，頁1480。

感，進而形成對南方社會的一種輕蔑意識。時日既久，自然會引發南方人心理上的嫌隙，如《晉書·陸機傳》記載：

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萁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眾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sup>104</sup>

張華不僅是當時北方文壇與政界（位至三公）的中心人物，也是北人中較能夠理解接納南方人的特殊例子。事實上，在晉滅吳的戰役中，張華還是為晉武帝出謀策劃的主要功臣之一。<sup>105</sup>然而他不僅對陸機兄弟頗具善意，也樂於禮薦南方俊才進入北方社會，如顧榮、薛兼、紀瞻、閔鴻、賀循等「南金」<sup>106</sup>都是依附著張華進入北方社會的，<sup>107</sup>顯見張華氣度識見之不凡。至於其他北人就不如張華友善，他們就像引文中的王濟和盧志一樣，對於這些「亡國之餘」非常輕慢，甚至充滿敵意。王濟以羊酪借題發揮，意在羞辱而非比較南北風物，其所隱藏的北方優越感從中可見一斑。至於盧志對陸機父祖直呼家諱，在當時士族社會中更是無禮至極，以致於陸機立刻反唇回擊，還施其身。但是，陸機的反應看在一旁的陸雲眼

<sup>104</sup> 見房玄齡：《晉書·陸機傳》，頁 1472-1473。

<sup>105</sup> 參見廖蔚卿：〈張華與西晉政治之關係〉，收錄於氏著：《中古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5年3月），頁 325-333。

<sup>106</sup> 房玄齡：《晉書·薛兼傳》：「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頁 1832。

<sup>107</sup> 關於張華與南方文人的互動，可參見佐藤利行著；周延良譯：《西晉文學研究》第一章〈西晉的文學集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6月），頁 22-114。

裡，卻感到極度惶恐不安，而一句「殊邦遐遠」更是道盡了入洛吳士對於現實處境的無奈。

南人入洛的處境既已如此，仕途際遇則更顯波折，陸雲留下的許多珍貴的書信，適足以說明揭露當時南人仕進的困難情形。如〈與戴季甫書·之三〉：「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柰何柰何！江南初平，人物失敘，當賴俊彥，彌縫其闕。」〈與楊彥明書·之三〉：「階塗尚否，通路今塞，令人罔然。」〈之六〉：「東人近未復有見敘者，公進屈久，恆為邑罔黨。」〈與陸典書書·之五〉：「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愚以東國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皆苦，皆未如意。」<sup>108</sup> 這些困頓與憤懣不只是陸雲個人的感受，更可以說是南方人士的集體心聲，<sup>109</sup>誠如《晉書·陸雲傳》所記載的〈孫惠與朱誕書〉：「不意三陸相攜闡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sup>110</sup> 代表江東士族的陸機、陸雲、陸耽三兄弟相偕入洛，向洛陽政壇問津，結果卻四處碰壁，最後甚至在政治權力衝突下未能善終，<sup>111</sup>此看在吳人眼裡，豈是陸氏一門的悲哀而已！

與陸氏兄弟齊名並同時入洛的顧榮，雖說能夠全身於西晉政壇，然其仕宦的心路歷程亦是苦不堪言。《晉書·顧榮傳》對顧榮入仕晉廷臨淵履深、瞻前顧後，以致於身心俱疲的情形有非常深刻的描繪：

---

<sup>108</sup> 陸雲的三封書信，俱引自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0月），頁1084-1086。

<sup>109</sup> 西晉政權一直排斥吳人是不爭的事實，陸機就曾上疏論及：「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見房玄齡：《晉書·賀循傳》，頁1842。

<sup>110</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1486。

<sup>111</sup> 請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西晉王朝對待吳人條」，收錄於氏著：《周一良集》第二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頁112-115。另參見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第七章〈路陸機雲兄弟之死與南北地域衝突〉，頁156-175。

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旃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疏，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旃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旃然之，白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sup>112</sup>

又《晉書·張翰傳》記載：

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sup>113</sup>

從張翰與顧榮的對話，不難看出顧榮的小心謹慎已然名聞其時，其政治嗅覺更是高人一等，身段亦俐落，從他曾參與陳敏之亂卻能全身而退，又奉迎司馬睿建國江東，終成東晉開國重臣，便可知曉。面對西晉險惡的政治環境及洛陽社會對於南方人士的敵視，以江東首望顧榮之能耐尚覺倍感壓力而屢起退隱之思，遑論其他南方官員。

值得一提的是，顧榮所參與的「陳敏之亂」並非單純的歷史事件，細察之下應是江東人士長期受到壓迫以致於不滿情緒爆發。雖然史傳皆云：以顧榮為首的江東士族是因為受陳敏所逼，才不得不屈附而假裝與之合作。但這可能是史官為了顧及東晉開國功臣顧榮的名節，不惜曲筆修飾。事實上，江東大族與陳敏應該

---

<sup>112</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 1812。

<sup>113</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 2384。

有一個合作的過程，本欲藉此復國，只是後來情勢有變，又懼於各種壓力，再加上陳敏出身寒微，又非江東人，這才放棄割據江東的念頭，轉而潛謀圖敏。試想，以當時江南的社會結構而言，如果不是獲得江東大族的默許與合作，陳敏想要佔據江東一年多的時間談何容易。在此之前曾發生石兵之亂，規模甚大，但江東大族同起義兵，不過數月即戡平亂事。事後更不言功賞，散眾還家，此亦說明江東大族興兵討逆，意在保全故里而非效命晉廷。<sup>114</sup>顯然晉武帝太康元年滅吳之後，吳人自始自終從未心服，因而屢有反叛。實例如太康三年，「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sup>115</sup>又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眾攻郡縣，自號將軍。」<sup>116</sup>、「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聚眾反。」<sup>117</sup>「十二月，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縣，州郡捕討，皆伏誅。」<sup>118</sup>而真正最能反映江南民心念念不忘復國的，是盛傳於當時的一些童謠：「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sup>119</sup>因此，一旦北方局勢有變，「當有帝王興於江左」<sup>120</sup>的傳言便不絕於閭巷之間。

高明士指出：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工程，除了進行軍事上的統一之外，必須還要考慮有利於統一的客觀環境因素，注意歷史的發展趨勢是否已經呈現出統一的契機，其中最重要者莫過於「敵意的緩和」與「文化的認同」這類社會文化面向，唯有這幾個方面能夠配合，才有可能進行結構穩定的統一工程，倘若只是藉由軍事力量進行統一，而未能在社會文化方面有足夠的號召力，這個統一局面也無法維持太久。<sup>121</sup>晉人未能看清此一複雜的歷史發展結構，當然更不可能積極緩和南

---

<sup>114</sup> 參見王永平：〈江東士人與陳敏之亂關係考實〉，《江海學刊》（1997年01期）頁121-124。

<sup>115</sup> 見房玄齡：《晉書·武帝紀》，頁74。

<sup>116</sup> 見房玄齡：《晉書·武帝紀》，頁77。

<sup>117</sup> 見房玄齡：《晉書·武帝紀》，頁78。

<sup>118</sup> 見房玄齡：《晉書·武帝紀》，頁78。

<sup>119</sup> 見房玄齡：《晉書·五行志》，頁844。

<sup>120</sup> 見房玄齡：《晉書·張昌傳》，頁2612。

<sup>121</sup> 參見高明士：〈隋代中國的統一——兼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收錄於中國歷史上的

北地域之間的敵意，因此，不到四十年的時間中國便再度陷入分裂的局面了。

### 第三節 東晉時期的地域文化之爭

永嘉之亂，神州傾覆，懷愍二帝先後被俘，鎮守建業的瑯琊王司馬睿趁勢在江東稱帝，開啓歷史上的東晉王朝；北方則戎夷滑夏，進入十六國春秋。是時，地分南北，人分南北，國分南北，故此階段的地域文化之爭愈顯複雜。除了漢民族本身的南北地域區隔，還加入新的衝突元素，即胡漢民族之間的夷夏之防。本節依序分成三個層面進行論述：首先是北人南下避禍進入江東社會，而與當地南方人士產生文化衝突；再來是五胡亂華之後，胡、漢民族的隔江對抗與胡族政權的正統表述；最後是北方漢民對東晉北伐的不堅感到失望，加上民族意識日益消磨，竟使原本不願服屬胡族的心理逐漸轉變。

#### 壹、江南社會的南北地域文化衝突

從「三分歸晉，南人北上」到「晉室失御，北人南下」，其間歷時不過短短三十餘年便峰迴路轉。先是江東士族以亡國之民忐忑入洛，欲攀結洛陽權貴卻遭無禮對待，而今物換星移，中原士族被迫南下避禍，面對此去前景未卜以及向來鄙夷的魚鼈之地，內心感受更是五味雜陳，其情或如《世說新語·言語》所載：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sup>122</sup>

衛玠是當時極富盛名的清談名士，此其永嘉亂世攜家渡江之嘆也。《晉書·衛瓘傳》曾略記此事：「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

---

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89-128。

<sup>122</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本》，頁 94。

玠啟諭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sup>123</sup>魏晉玄學賤有貴無，以「無」為最高理境，而叔寶作為一位傑出的清談家，面對國破家徙也不得不反覆辯證有情／無情而慨然感嘆情之所鍾不能自遣。叔寶之嘆乃為凌駕凡情之「有情」，須知真情實意亦當時名士所追求之生命情境，《世說新語·傷逝篇》是最直接的證據。叔寶一聲長吁，不再囿於有無之框架，乃魏晉名士「情之所鍾，正在我輩」<sup>124</sup>的真情流露。余嘉錫云：「叔寶南行，純出於不得以。明知此後轉徙流亡，未必有生還之日。觀其與兄臨訣之語，無異生人作死別矣。當將欲渡江之時，以北人初履南土，家國之憂，身世之感，千頭萬緒，紛至沓來，故曰不覺百端交集，非復尋常逝水之嘆而已。」<sup>125</sup>而感嘆衣冠南渡，江水茫茫，愴然淚下者豈止一人而已！「新亭對泣」的著名場景正是北客集體創傷的真實演出，《世說新語·言語》記載：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sup>126</sup>

就地理環境而言，建康在長江流域，洛陽在黃河流域，故云有江河之異；然兩者山川地貌又極為相近，故云風景不殊：洛陽北有芒山，南枕洛水，西有伊水，東環穀水；建康北有覆舟、鷄籠山，南枕秦淮河，西遠臨大江，東有清溪，故南齊山謙之《丹陽記》嘗云：「出建陽門，望鍾山之與覆舟，似上東門首陽之與北芒也。」<sup>127</sup>南來北客身處景似洛中的建康城，對於時空變異特別敏感，加上又是被

<sup>123</sup> 見房玄齡：《晉書·衛瓘傳》，頁 1063。

<sup>124</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638。

<sup>125</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95。

<sup>126</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92。

<sup>127</sup> 引自李昉：《太平御覽》（台北：大化書局，1980年），頁 197。

迫離開家園，是以寄人國土猶如楚囚的思鄉情愁愈顯沉重。〈言語篇〉的另一則記載把北人南下，漂泊無根的離散感反映得更加深刻：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128

元帝惴惴地一句「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不僅將北人南渡的無可奈何表露無遺，更凸顯西晉將近四十年時間的統一完全是個歷史假象，晉廷根本就從未真正控有江南，更遑論消解南北地域長期間的文化衝突與矛盾。自西晉統一之初，吳人就一直未能臣服新朝而相繼作亂，晉廷除了重兵嚴防江表之外，最後也不得不採取南人治理南方的政策，委派當時入洛的南方官員回鄉治理故郡。<sup>129</sup>而從南方發生的幾次大型叛亂觀之，張昌、石冰、陳敏之亂皆由江東大族幫忙戡定，可見南方土地的真正治理者還是南方大族。陳寅恪解讀此一階段歷史變遷，以為：「東晉元帝者，南來北人集團之領袖。吳郡顧榮者，江東士族之代表。元帝所謂「國土」者，即孫吳之國土。所謂『人』者，即顧榮代表江東士族之諸人。當日北人南來者之心理及江東士族對此種情勢之態度可於兩人問答數語中窺知。顧榮之答語乃允許北人寄居江左，與之合作之默契。此兩方協定既成，南人與北人戮力同心，共禦外侮，而赤縣神州免於全部陸沉，東晉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決定矣。」<sup>130</sup>就當時南北局勢的發展觀之，江東士族亦有不得不接納北方士族南下的壓力。後趙石勒曾打到南沙、海虞、婁縣、武進；石虎又打到歷陽，兵臨長江。因此，單憑南方人的力量是否真能抵擋胡馬渡江在此存疑。因此，爲了江東及本身厲害考

<sup>128</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91—92。

<sup>129</sup> 參見佐藤利行著；周延良譯：《西晉文學研究》第二章〈以陸機爲中心的文學集團〉第五節「西晉朝廷對南人的政策—利用南人統治南方」，頁 141-147。

<sup>130</sup> 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錄於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59。

量，江東士族似乎也不得不與北方士族協力合作以阻止胡騎窺江。畢竟南北界線比起夷夏界線，顯得微不足道。又設若南北士族不能協調，司馬睿可能無法南下，新局面也就難以成立。<sup>131</sup>

另外，《晉書·五行志》中有一段記載，或許也可以幫助我們從不同的面向去理解吳人對司馬睿建國江東的心態：<sup>132</sup>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慙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sup>133</sup>

從引文觀之，吳人認為東晉新朝的建立並不屬於西晉政權的延續，而是吳人忍辱四十年之後的重新復國，故云「中國當敗吳當復」！而從西晉初年陸機寫〈辨亡論〉到東晉初年葛洪寫〈吳失篇〉，大概也可以觀察出吳人的認知是：吳國猛士如林，英才濟濟，之所以會亡於晉，是因為皇室太過頹廢，並不等於可以就此定南北之優劣。西晉滅吳，吳人從未心服，並堅信不久之後即會復國。因此，雖說歷史學上普遍將東晉政權視為西晉政統的延續，但是在當時吳人的眼中，元帝興於江東恐怕是一種預言的應驗，是一個全新政權的建立，而非北人南下繼續統治吳地。

一般常誤以為東晉的建立是因為胡羯作亂、晉室倉皇南逃，但事實是司馬睿早已和王導君臣私議、籌謀割據，是以才能很快地確立江東政權。據《晉書·元帝本紀》記載：

---

<sup>131</sup> 參見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九篇〈東晉與江南士族之結合〉，頁169-170。

<sup>132</sup> 參見姚大中：《南方的奮起》（台北：三民書局，1981年5月），頁102-106。

<sup>133</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844。

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協並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sup>134</sup>

永嘉元年，王導默察時局，推測中原即將大亂，遂勸元帝積極運作，開擘江東，以成新局。元帝亦知人善任，軍謀密策，倚任王導，<sup>135</sup>遂能在北方政局日見險惡之際轉鎮建鄴，以待局勢之變化。從上述引文亦可發現，元帝初到建鄴就極力拉攏江東士族，延請江左名士，禮賓故老，存風問俗，以緩解南北矛盾，博取江東民心為首要之務。而江東士族領袖顧榮、賀循更是指標性人物，所以自始王導就建議元帝禮攬二人進入統治集團，以鞏固江東人心。《晉書·王導傳》記載：

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sup>136</sup>

結果正如王導所料，當顧、賀二人願意與新政府合作時，江東百姓也就隨之歸順了。不過，從南北文化相爭的歷史軌跡隨想便知，江東士庶歸順新朝的過程不可能太順利。史書記載元帝「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sup>137</sup>，即江東人士對於新來乍到的元帝不僅不順服，甚至還不理不睬，態度極其冷淡。

---

<sup>134</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 144。

<sup>135</sup> 《世說新語·言語》第三十三則「顧司空未知名」條引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95。又房玄齡《晉書·王導傳》：「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軍謀密策，知無不為。」頁 1745。

<sup>136</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 1746。

<sup>137</sup> 見房玄齡：《晉書·王導傳》，頁 1745。

王導看出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尋思拉抬元帝聲勢的辦法，《晉書·王導傳》記載：

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sup>138</sup>

王敦是王導從兄，當時擔任揚州刺史，在南方社會具有相當的名望。因此，王導敦請王敦相助，藉由隆重的儀仗與威嚴的行伍等儀式化的方式，增加元帝的領袖魅力（charisma），將其標明為新的政治中樞，並配合一群統治菁英，建構出一套權力關係，使在那裡所發生的事平添一種魔力。<sup>139</sup>如此一來，江東人士自顧榮、紀瞻以下果然感覺到這群人似乎真的在進行統治了，驚懼之餘紛紛伏地拜倒路旁，自此以後元帝在吳人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遂使江東士族日後願意主動向新朝靠攏。

不僅如此，爲了調和化解南北文化之間的隔閡；消弭緩靖南北士族的對立氣氛，王導還主動想與南方士族聯姻，孰料竟受到南方士族的羞辱。《世說新語·方正篇》記載：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sup>140</sup>

余嘉錫箋疏曰：「王、陸先世，各有名臣，而功名之盛，王不如陸。過江之初，

---

<sup>138</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 1745-1746。

<sup>139</sup> 參見克利弗德·紀爾茲著；楊德睿譯：《地方知識》第六章〈中樞、帝王與領袖魅力：對於權力象徵的反思〉（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3月），頁 171-204。

<sup>140</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05-306。

王導勛名未著，南人方以北人爲傖父，故玩託詞以拒之。其言雖謙，而意實不屑也。又〈排調篇〉云：『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賡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可見其於王導輕侮不遜，宜其不與之通婚矣。導屢見侮於玩而不怒，亦以其族大宗強，爲吳人之望故也。若蔡謨九錫之戲，導即憤然形於詞色矣。」<sup>141</sup>此外，王導也非常用心地學習當地語言，其籠絡江東士民之意昭然可見。《世說新語·排調》云：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淘？」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sup>142</sup>

〈輕詆篇〉亦載王氏子弟皆樂操吳語：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sup>143</sup>

余嘉錫箋疏：「瑯琊王氏本非吳人，而以吳語爲真長、道林所笑，故當別自有意。……及五胡雲擾，中原士大夫相牽過江，雖久居吳土，舉目有山河之異。……談玄便思正始名士，詠詩必學洛下書生。雖曰樂操土風，亦所以自表其爲故家舊族也。王導系出瑯琊，生於京、洛，思舊之情，時縈夢寐。觀其於洛水邊遊戲（見企羨篇「王丞相過江」條），……知其不忘故土矣。第以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

---

<sup>141</sup>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05-306。案：關於蔡謨九錫之戲一事，見房玄齡《晉書·王導傳》：「（王導）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頁 1752-1753。

<sup>142</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792。

<sup>143</sup>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848。

附，導勸帝虛己順心，引用南士（見晉書本傳）。又自欲與陸玩結婚，皆所以調和南北，消弭異同也。即其造次之間，偶作無語，亦將以此達彼我之情，猶之禹入裸國而裸耳。陳寅恪曰：『王導、劉惔本北人，而又皆士族，導何故用吳語接之？蓋東晉之初，基業未固，導欲籠絡江東人心，作吳語者，亦其開濟政策之一端也。』<sup>144</sup>

王導亟欲拆毀南北壁壘，消弭異同之意圖既如上述，睹微知著，其他重大施政必也盡量避免與江東士族利益衝突，例如僑州郡之設立，其目的不僅是安置流人，也是有意區分北人與吳人的居住地，避免無謂衝突；另北方士族的莊園設置亦多避開江東士族聚集的太湖流域，而往浙、閩一帶去開發，維持江東士族既有的經濟利益。<sup>145</sup>但是，南北之爭，百年鬱結，又豈是一朝一夕可以消解。尤其政治權利的分配不均，<sup>146</sup>北人多居顯要，南人徒具虛名而無實權，江東士族很快地察覺司馬睿政權虛與委蛇的態度，因而孳生不滿，其中又以義興周氏的武裝叛變最為激烈。《晉書·周處傳》附〈周玘傳〉記載：

玘宗族強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為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

<sup>144</sup>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793-794。案：〈企羨篇〉「王丞相過江」條：「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頁 631。

<sup>145</sup> 參見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頁 330。又鄭欽仁等著：《魏晉南北朝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 年 8 月），頁 144。

<sup>146</sup> 周一良曾針對東晉的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吏部尚書、領護、刺史等中央官吏的南、北人任職情形進行統計，頗能清楚照見東晉的政權結構：

籍貫\官職	尚書令	僕射	中書監令	侍中	吏部尚書	領護	刺史
北人	22	31	20	55	24	44	245
南人	4	10	賀循一人，未就	17	5	10	34

參見氏著：〈南朝境內支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 59-60。

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喜。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總曰：「殺我者諸僮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僮」，故云耳。……總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總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總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眾，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眾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總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眾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總為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sup>147</sup>

周玘為刁協蔑視，王恢受周顛侮辱，皆南北相輕所致。北方亡官失守之士南來作客，卻反客為主，佔居高位，駕馭吳人，吳人心理上的憤懣不平可想而知。因此，當周氏父子號召起義時，南方世族多有聚眾響應者，顯示江東人士對於南來北客居上凌下的情形嗟怨已久。雖說武裝叛變很快遭到平定，但是北來士族似乎也被南方豪族的激進所震懾，因此即便周氏起義是以討伐王導、刁協為名，但礙於周氏累代豪望，吳人所宗，事後朝廷也不敢加以追究，而依然採取籠絡的一貫態度，畢竟還得顧慮所有江東士族的觀感，以及日後南北士族仍須通力合作，共同抵抗北方胡羯的現實考量。

---

<sup>147</sup> 參見房玄齡：《晉書·周處傳孫總附傳》，頁 1573-1574。

事實上，江東政權以北人為主體的結構要持續到真正代表南方勢力崛起的陳朝才有變化，無論是代晉而興的宋，抑或齊、梁，都一直是北人稱帝的情形，故在政府機要的職掌上，江東士族比起北方士族仍相形見绌。<sup>148</sup>《南齊書·張緒傳》嘗記載齊太祖蕭道成欲拔擢張緒（吳郡吳人）為右僕射一事，可以佐證江左士人入仕升遷之困難：

（齊太祖）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為准則。」上乃止。<sup>149</sup>

又《南齊書·沈文季傳》曾記載齊世祖蕭蹟與沈文季的一段對話：

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

<sup>148</sup> 陳寅恪指出，南朝前期宋、齊、梁的政治史，概括言之，是北人中善戰的武裝豪族為君主，而北人中不善戰之文化高門為公卿，相互利用，以成統治之局的歷史。參見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第十一篇〈楚子集團與江左政權的轉移〉，頁 217。又周一良曾針對南朝宋、齊、梁、陳的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吏部尚書、領護、刺史等中央官吏的南、北人任職情形進行統計，頗能清楚看見南朝的政權結構及南北人消長之情形：

朝代	籍貫\官職	尚書令	僕射	中書監令	侍中	吏部尚書	領護	刺史
宋	北人	15	31	24	68	22	42	337
	南人	0	0	0	15	6	6	44
齊	北人	11	15	21	34	10	27	171
	南人	0	1	1	5	4	5	29
梁	北人	8	16	18	49	24	33	319
	南人	3	6	4	10	3	7	21
陳	北人	1	12	7	11	9	5	13
	南人	1	5	6	19	5	17	201

<sup>149</sup> 見蕭子顯：《南齊書·張緒傳》（台北：鼎文書局，1998年），頁 601。

一日。」<sup>150</sup>

南人參政的權力的確長期受到北人的排擠，從東晉歷經宋、齊仍未改變。故丘靈鞠（吳興烏程人）曾憤懣不平地云：

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  
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sup>151</sup>

江東政權由北人秉持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南方人陳霸先崛起才徹底翻轉。侯景亂梁（548）使得僑姓世家大族遭受嚴重打擊，南方寒門武將與地方豪強勢力則乘勢而起建立新朝，<sup>152</sup>遂改變了官僚體系的結構，使原本居次的南人取代北人，成為陳朝政權的主體結構，取得相對優勢。只是日後隨著陳朝政權的逐漸穩固，武帝、文帝兩朝欲求名士以立朝堂，導致門閥觀念復起，遂又造成統治集團間北方文官（士族）與南方武將（寒門、土豪）的對立、衝突，也埋下陳朝後期南北文武官員不能協調，以致於「文武解體」<sup>153</sup>。最離譜的是，南北之間文官武將的惡鬥，甚至造成日後隋軍南犯之際，文官掩飾軍情、掣肘武將的惡行，遂使戰局全面失利，<sup>154</sup>終於結束江東政權自公元三一七年晉武帝五馬渡江至五八八年陳後主投井藏身，凡二百七十二年的歷史。<sup>155</sup>

<sup>150</sup> 見蕭子顯：《南齊書·沈文季傳》，頁 778。

<sup>151</sup> 見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附丘靈鞠傳》，頁 890。

<sup>152</sup> 參見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第六章〈南朝的政治與經濟〉，第五節〈陳王朝得建立與衰亡〉，頁 459-469。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第十二篇〈梁陳時期士族的脈絡與南方蠻族的興起〉，頁 219-242。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第二、三、四章，（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 3 月），頁 27-149。

<sup>153</sup> 見李延壽：《南史·恩倖傳》（台北：鼎文書局，1998 年 11 月），頁 1938。

<sup>154</sup> 詳參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第六章〈陳朝內部的弱點及其滅亡〉，頁 185-238。

<sup>155</sup> 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有云：「權力與族群關係之所以能夠運轉，關鍵在於外在與內在的現實與迷思都能夠維持不墜；其所以能夠存活，關鍵在於它能夠克服外來的挑戰或保持均勢，而內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並接受現狀。」見氏著；鄧伯宸譯：《族群》（台北：立緒

## 貳、胡漢民族的隔江對抗與北方政權的正統表述

自漢魏以來，西境和北境的少數民族便不斷向內遷徙，滲入中原社會。晉室爆發八王之亂，各方諸侯爲了擴增勢力，爭先籠絡少數民族，以胡軍爲援，不料竟引狼入室，遂使帝鄉變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衣冠慚惶南渡，形成南方漢族政權與北方胡族政權隔江對峙的局勢。

《晉書·劉元海載記》曾簡明述說這時期北方胡族政權的發展概況：「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禘，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sup>156</sup>西晉潰亡之後，以匈奴、羯、氐、羌、鮮卑爲主的少數民族大規模入侵華夏，在中國北方和巴蜀相繼建立了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後燕、後秦、南燕、夏、前涼、成漢、後涼、西秦、南涼、西涼、北涼、北燕等二十餘國，古史擇要統稱爲五胡十六國時期。

諸胡入主中原之後，首要工作就是解決族群矛盾的問題。自春秋晚期，位於北邊的華夏諸侯國就已陸續築起城垣，防堵北方部族南下。秦統一中國之後，更積極連結各國舊城，形成一道區隔內、外的「萬里長城」。長城不僅是分隔胡漢

---

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11月），頁2。論陳朝覆亡之因，再回顧東晉建國之初，更可顯示哈氏此語之洞見。

<sup>156</sup> 參見房玄齡：《晉書》，頁2644。

的地理座標，也是草原社會與農耕文明的人工界線，更是一座殊別意識型態的文化巨牆。長城之內隨著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等強制政策的推動，進而形成統一的文化，也強化了國家的凝聚力，<sup>157</sup>從此正式確立「漢人」的自我意象，<sup>158</sup>並開始以一種「華夏」民族的思想文化與價值系統對包含在匈奴之下的「非華夏」民族進行詮釋；說明與評價他們為何不是華夏。<sup>159</sup>《史記·匈奴列傳》開始對匈奴人有如此之描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駃、騊駼、騂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毋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sup>160</sup>

---

<sup>157</sup> 參見劉澤華主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1月），第四章〈大一統與政治分合〉，頁147。

<sup>158</sup> 王明珂指出：「漢代是『中國人』異族意象與自我意象形成的關鍵時代。主要原因是：（1）漢帝國是華夏形成後第一個維持較久的統一帝國，這時中國與四裔族群的關係，是形成中國人異族意象與自我意象的關鍵；（2）漢帝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達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態地理極限，以及帝國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極限；（3）漢代是中國有系統「正史」記載之始，文字歷史記憶，使得在漢代形成的華夏自我意象與異族意象沿續下去，深深影響後世的中國人。」參見氏著：《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十章〈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台北：允晨出版社，2001年5月），頁290。

<sup>159</sup> 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十章〈漢人形成：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頁293-295。

<sup>160</sup> 見司馬遷：《史記》，頁2879。

在西漢人的認知中，基本上視匈奴為夏后氏的後裔，與華夏同源，只是在生活文化上有所差異：漢人以農立國，匈奴則是逐水草遷徙；漢人早有文字，匈奴則僅有語言；漢人行王道禮義，匈奴則侵伐為性，不知禮義，略於人倫。也因此到了東漢時期，班固《漢書·匈奴傳》已經不再承認匈奴與華夏同出一源的事實，轉而強烈區隔內外民族的差異性：

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sup>161</sup>

班固認為夷狄與諸夏之間的分別不僅是服飾、習俗、飲食、言語、生活方式不同，更在於夷狄貪而好利，人面獸心，因而華夷之間自然形成一種內外阻隔。班固此說幾乎將爾後「夷夏之防」的相關言論囊括殆盡。雖說後來東漢末年已經有「入塞匈奴」與漢人雜處，開始接受漢化；魏晉時期的匈奴甚至連社會生活型態都已和漢人趨於一致，並且匈奴的上層已經從漢化向士大夫轉化，<sup>162</sup>但是漢人心中的「夷夏之防」卻與日遽增，並未因著夷狄漢化而卸下心防。一些有識之士反而更加謹慎，如鄧艾〈上言宜割右賢王劉豹部為二國〉：

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sup>163</sup>

---

<sup>161</sup> 《漢書·匈奴傳》（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3833—3834。

<sup>162</sup> 案：入塞匈奴的生活已從畜牧改成農業，匈奴上層對於經史子集也無一不覽。參見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第七章〈民族矛盾的激化及其演進〉，第一節〈入塞匈奴和屠各劉氏政權〉，頁153-156。

<sup>163</sup> 見陳壽：《三國志·魏書·王毌丘諸葛鄧鍾傳》（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776。

〈又陳羌胡事〉：

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sup>164</sup>

而主張「徙戎」的，則要以江統〈徙戎論〉最具代表性：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sup>165</sup>

春秋戰國時期分裂鬆散的華夏民族，歷經秦、漢、魏、晉的歷史發展階段，早已融合為成熟的漢民族，與邊疆民族有著根深柢固的夷夏區隔，幾乎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民族主義。尤其在此之前，從未有過胡人進入中原地區稱王稱帝的情形。因此，面對前來稱王的異族，不僅漢人心理難以接受，胡人也是戰戰兢兢。誠如東晉北伐名將劉琨曾遣書諫勸羯人石勒曰：「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sup>166</sup>而石勒為取信於當時的晉幽州烏丸校尉王浚，

---

<sup>164</sup> 見陳壽：《三國志·魏書·王毌丘諸葛鄧鍾傳》，頁 776。

<sup>165</sup> 見房玄齡：《晉書·江統孫楚列傳》，頁 1529-1534。

<sup>166</sup> 見房玄齡：《晉書·石勒載記》，頁 2715。

亦曾假意奉表推其為天子，派遣舍人王子春持書前往告知曰：「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sup>167</sup>不僅如此，即使已經逾歷數朝，在劉淵稱王達半世紀之後的羌酋姚弋仲亦嘗戒諸子姚萇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sup>168</sup>前燕慕容廆亦曾云：「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書，強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sup>169</sup>慕容儁在羣臣勸進之時，亦云：「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曆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sup>170</sup>凡此種種，皆可見戎狄不能作為中華共主應是當時胡漢社會的普遍共識。<sup>171</sup>

話雖如此，五胡還是在中原建立了十餘國，故可看到諸胡逐鹿中原的過程中，為了博得漢人的認同，幾乎都是索盡枯腸地在華夏歷史中尋覓、攀附一個祖宗，宣稱華夷「同祖同源」，<sup>172</sup>在族源關係上爭取、賦予自己「炎黃裔胄」的身分，以打破漢民心中的華夷忌諱，其用意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普拉姆所云：「『過去』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要為『現在』取得合法性，基本上也就是為權力與權威取得認可。早期的統治者與統治階級在追溯自己的身世與權力時，無不想方設法攀緣皇

---

<sup>167</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二〈後趙錄錄二·石勒〉，頁 87。

<sup>168</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九〈後秦錄一·姚弋仲〉，頁 375。

<sup>169</sup> 見房玄齡：《晉書·慕容廆載記》，頁 2804。

<sup>170</sup> 見房玄齡：《晉書·慕容儁載記》，頁 2834。

<sup>171</sup> 參見劉學鈔：《五胡史論》（台北：南天書局，2001 年 10 月），頁 25。又陳侍宗：《所謂「十六國」歷史的再閱讀：以戎狄可否作天子之間為開端》亦值得參考。（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胡昌智先生指導，1987 年 6 月）。

<sup>172</sup> 參見吳懷祺主編、龐天佑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合肥：黃山書社，2003 年 11 月），頁 51。案：是書頗關注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民族關係與當時歷史學上正統論述的問題，對本文此一段落「從『民族血緣的關係』立論正統」之思考亦多有啟發。參見是書第二章〈民族關係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思想史〉，頁 37-59。

室甚至神聖的權威，其道理即在於此。」<sup>173</sup>

民族本身就是敘述！敘事是一個族群用來肯定自己的認同和自己的歷史之存有的方法，<sup>174</sup>例如五胡之中率先崛起的劉淵即如此迂迴曲敘匈奴入主中原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眾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sup>175</sup>

又云：

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sup>176</sup>

---

<sup>173</sup> 參見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174。

<sup>174</sup> 參見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1 年 1 月），頁 3。

<sup>175</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前趙錄一·劉淵〉（台北：鼎文書局，1995 年 6 月），頁 5。

<sup>176</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前趙錄二·劉淵〉，頁 7-8。

劉淵先是振振有詞地以漢文化中的上古聖王大禹、文王生於西戎、東夷，原非中原人士，對胡漢民族之間的界線進行模糊、淡化；再娓娓說明只要有德有能，不分族別，均可以成爲天下共主。其說之所以能夠言之鑿鑿，正是因爲借用了孟子的說法：「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sup>177</sup>因此，劉淵期勉自己追求漢高之業，即或不然，亦不失爲魏武。尤其強調匈奴曾爲漢氏之甥，又有兄弟之約，<sup>178</sup>今兄亡弟紹，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劉淵堂堂皇皇的歷數漢代諸君，彷彿翻閱自家祖譜，又對司馬晉失德以致生靈塗炭加以指斥，是以在眾望之下挺身而出，紹修三祖之業，「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sup>179</sup>，以「漢」爲國號，<sup>180</sup>開創五胡的第一個政權。爾後興起的胡主皆循此例，前趙劉曜亦曾云：「我皇家之先，出於夏后……。」<sup>181</sup>如「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sup>182</sup>的赫連勃勃便揚言：「朕大禹之後，……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

---

<sup>177</sup> 見：《孟子·離婁下》，引自：《十三經注疏·孟子》，頁 141。

<sup>178</sup> 邢義田〈天下一家——傳統中國天下觀的形成〉指出：「漢初即從『家』的理念來建立與匈奴的關係。高祖和單于約爲兄弟。婁敬主張與匈奴和親，是希望藉子婿、外孫與大父的關係來約束單于。他說『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文帝寫信給單于曾表示『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帝初，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降漢之呼韓單于盟誓。……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與蠻夷之邦合爲一家，與他們的君長稱兄道弟，……乃是情勢所破。」收錄於氏著：《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6月），頁 34。

<sup>179</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前趙錄二·劉淵〉，頁 8。

<sup>180</sup> 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以爲：「從一個民族、一個地方、一個觀念，在其遙遠或最近的過去當中，國家的名字經常會反映出某種概念。」見氏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108。

<sup>181</sup> 引自嚴可均：《全晉文》，頁 1599。

<sup>182</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四〈夏錄一·赫連勃勃〉，頁 464。

<sup>183</sup>而先後建立前燕、後燕、西燕、南燕等國的鮮卑慕容氏則號稱為「有熊氏之苗裔」<sup>184</sup>。另前燕慕容廆在遊說中州大族高瞻至馬前效力時，亦曾云：「柰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sup>185</sup> 凡此正如赫南（Ernest Renan）〈何謂國族？〉這篇演講所云：「遺忘歷史，乃至扭曲歷史，才是國族創立的真正樞紐。」而國族歷史其實就是一套「神話歷史」（myth-history），他的編造者並不在意他們所說的「過去」是否正確真實地存在，其目的只是再汲取、操弄特定的「過去」，例如重新編寫、記憶，甚至重新發明、創造、想像國族的起源與傳統，以求為政治的、意識型態的，以及心理上的需求服務。這種「神話歷史」所指向的，乃是「歷史的政治運用」。<sup>186</sup>

另外，諸胡同時注意到漢人五德終始的政治繼承學說，紛紛尋求歷運以明法統。<sup>187</sup>劉淵起事之時，西晉未亡，故建國名義上自然不可能繼承晉統，又因為晉承魏統而來，是以承魏之路亦塞，故劉淵考其先祖與漢廷的舅甥關係，遙繼漢統，以漢為國號，並以司馬氏失德為由排除魏晉一脈的合法性，為自己爭取到具有歷史依據的有利地位。到了劉曜主政時期，由於初步代晉的目標已然實現，現在為了進一步吸引晉朝遺民，並杜絕其餘少數民族如羯人石勒集團的覬覦，是以又調整歷運轉而承認晉代的正統性，宣稱「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sup>188</sup>，這樣一方面可以藉著宣告晉朝已經結束從而否定繼承晉統江左政權，另一方面又可以將匈奴在華夏土地上所建立的政權納

---

<sup>183</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四〈夏錄一·赫連勃勃〉，頁 467。

<sup>184</sup> 見房玄齡：《晉書·慕容廆載記》，頁 2803。

<sup>185</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三〈前燕錄一·慕容廆〉，頁 183。

<sup>186</sup> 參見沈松橋：〈召喚沉默的亡者：跨越國族歷史的界線〉，收錄於思想委員會編：《歷史與現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年6月），頁 82。

<sup>187</sup> 詳參羅新：〈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03期），頁 47-56。

<sup>188</sup> 見房玄齡：《晉書·劉曜載記》，頁 2685。

入華夏歷史序列中。幾乎與劉曜同時稱王的石勒亦「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sup>189</sup>，同樣繼承晉統。可是後來代趙而興的鮮卑慕容氏卻又不繼承趙統，而選擇遙繼晉統：「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曆傳屬，代金行之後，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sup>190</sup>似乎又否定了石趙的歷史合法性，其考量大概與石趙非真正華夏政權有關。但是與前燕並時而立的苻秦，卻又不理會華夷限制，直接承石趙水德而為木德。<sup>191</sup>而原本繼承晉統的前燕，後來又因慕容儁僭位，<sup>192</sup>重定五行次序，承認石趙的歷史定位，繼承趙統：「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sup>193</sup>這樣一來，石趙不僅成為首先獲得後繼者認可的合法胡族政權；更在歷史意義上為被華夷之別設限的胡族政權解套，甚至後來還出現所謂「五胡次序」的說法。《晉書·苻堅載記》記載前秦末業，苻堅被姚萇俘虜，姚萇向苻堅求傳國玉璽曰：「萇次膺符曆，可以為惠。」結果苻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sup>194</sup>五胡次序這種圖緯符命之說的流行，正是因應少數民族政權而生，透過五德終始學說的運用，使得華夷之辨不再那麼絕對，變成只要誰能「合法」佔有中原二京五嶽，誰就是華夏歷史的正統繼承者。

諸胡從攀談胡漢「同祖同源」到立論「五德承繼」，又同時強調空間地理上周漢帝都洛陽、長安的佔有，<sup>195</sup>甚至擴及九州、五岳等相關論述，其情正如現代

---

<sup>189</sup> 見房玄齡：《晉書·石勒載記》，頁 2746。

<sup>190</sup> 見房玄齡：《晉書·慕容儁載記》，頁 2834。

<sup>191</sup> 前秦的國統問題，史書雖無直接之記載，但是從姚萇「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可以推斷出來。見房玄齡：《晉書·姚萇載記》，頁 2967。

<sup>192</sup> 慕容儁僭位之初，還曾派蔣幹送「傳國玉璽」到建鄴，詐稱是冉閔妻得以之獻，欲「神其事業，言曆運在己」。參見房玄齡：《晉書·慕容儁載記》，頁 2834。

<sup>193</sup> 見房玄齡：《晉書·慕容儁載記》，頁 2843。

<sup>194</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 2928。

<sup>195</sup> 王師文進指出：「五胡諸國入主華夏的當務之急，便是提出正統論述，為鞏固政權尋求一個合

社會學理論進行民族識別時所強調的共同的歷史淵源的地域意識。<sup>196</sup>而坐擁洛陽、長安對於胡族繼承華夏政權正統的重要性，可以從石勒與徐光的一段對話充分展現。《晉書·石勒載記》曰：

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籙。……」光曰：「……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

197

因此，即便說洛陽經歷永嘉之亂以後已經殘破不堪，但石勒仍「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洛陽對於漢人的文化號召力可見一斑。

相較於洛陽，同樣象徵華夏文化正統的長安在此時期更是政權更迭快速，前趙、前秦、後秦、夏諸國先後選擇立都於「關中周漢舊都」<sup>198</sup>，此舉除了亟欲展現對漢文化的認同感，企圖合法紹繼華夏政權之外；更積極的動機則是想藉由立都長安為將來擘劃中國，經營寰宇提供正當性。典型實例可見《晉書·苻堅載記》：

---

法性的論據。而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外族政權爭取正統的立場也一再演進，從最初攀談『民族血緣的關係』次及主張『地理空間的佔有』再到強調『歷史文化的繼承』，隨著北方胡人政權的愈加強勢而層層轉進，其理論推演亦漸趨細緻，到了北魏洛陽時期，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力度，進而給予南朝政權極大的壓力。」見師著：〈北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兩種態度——以《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為中心的初探〉，《臺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四期（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年6月），頁122。收錄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

<sup>196</sup> 參見唐曉峰：《人文地理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1月），頁33。

<sup>197</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2753。

<sup>198</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一〈前秦錄一·苻洪〉，頁240。

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眾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sup>199</sup>

由上可知，唯有像苻堅這般抬頭挺立於累代舊都的長安帝王，方能臨風顧盼、暢敘思古幽情；左右大臣也才能夠比附夏、殷、周、秦，勸王上自我砥礪，修德愛民，追蹤唐虞。前秦君臣既有如此氣象，則無須驚訝苻堅召集羣臣共商伐晉時會產生如下之思維：

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饋，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sup>200</sup>

此完全是一個華夏正主的心態，東晉對苻堅而言，只是僭偽江表一隅，不賓王化的邊鄙之民。順著苻堅的心志，秘書監朱彤揣測上意，立即回應道：

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壁輿櫬，啟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

<sup>199</sup> 見房玄齡：《晉書》，頁 2885。

<sup>200</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前秦錄六·苻堅〉，頁 281。

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sup>201</sup>

其說充分揭示前秦帝國佔據中夏，含括五嶽的地理空間優勢，強調苻堅不僅可以祭祖敬天，封禪於泰山；亦可登頂嵩山，受萬民擁戴，這已完全是中華正統捨我其誰的信念。故苻堅每云：「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sup>202</sup>後來苻堅伐晉更說：「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寇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sup>203</sup>自古只有漢人稱異族為犬羊，於此竟一反傳統「夷夏之辨」的高低位置，<sup>204</sup>轉而由異族呼喊漢人為犬羊；並直接以中原上國之邦，認定建國於吳越邊鄙之地的東晉是僭偽，而欲以天子之姿代天巡狩，匡定九州，大會諸侯。

苻堅屢思混一六合，亟欲統一南北，使天下一軌，但是幕僚朝臣當中實不乏反對的聲浪。左僕射權翼便認為：

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sup>205</sup>

太子左衛率石越亦云：

---

<sup>201</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前秦錄六·苻堅〉，頁281。

<sup>202</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前秦錄六·苻堅〉，頁284。

<sup>203</sup> 引自嚴可均：《全晉文》，頁1649。

<sup>204</sup> 陳友冰：〈十六國北魏時期的「夷夏之辨」〉，《史林》（2000年第四期），頁23。

<sup>205</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前秦錄六·苻堅〉，頁281。

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sup>206</sup>

太子宏曰：

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sup>207</sup>

而最值得注意的說法，則莫過於被苻堅視為「夷吾」、「子產」之儁的宰輔王猛之臨終遺諫：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sup>208</sup>

另外，與王猛有同樣考量的，是身為苻堅最倚重的股肱心膂，史書以「王景略之流」讚譽，官拜尚書、司徒，屢建軍功，頗具軍事幹才的安樂王苻融：

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縵，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

<sup>206</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前秦錄六·苻堅〉，頁281-282。

<sup>207</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前秦錄六·苻堅〉，頁284。

<sup>208</sup> 引自：《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八，卷三十八〈前秦錄八·王猛〉，頁302。

又云：

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sup>210</sup>

由上述意見觀之，除了「晉未喪德」、「江表有人」、「長江之阻」及「吳今得歲」等外在原因，苻堅真正要面對的其實是北人的內在心理因素。北方政權在面對號稱紹承晉統的南方政權時，普遍心態顯得比較自卑，即使在言詞上已聲稱和漢民族「同祖同源」，並在五德歷運上已建構了「五胡次序」，甚至在地理空間上實際佔有「周漢舊都」，但是因為文化號召力量始終薄弱，故還是難以真正獲得北方漢民之肯定與認同。甚至十六國中的部分政權還以承認東晉的正統性來換取本身的合法性（最典型的例子是燕鮮卑慕容氏）。

總之，東晉時期的北方政局瞬息萬變，並未有一長治久安的政權能與南方真正抗衡，是以儘管諸胡強以族源關係爭取漢民認同；以五德終始建構朝代歷運；以坐擁周漢舊都強調地理空間佔有，皆未能真正撼動東晉的正統地位。直到北魏興起，才正式以「歷史文化繼承」作為正統訴求，形成與南朝分庭抗禮的歷史新局。

### 參、胡族統治下的漢民心態之轉變

永嘉之亂，海內崩裂，華夏政治文化中心隨著洛陽鼎璽一併南徙，移至江南

<sup>209</sup> 引：《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六》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八〈前秦錄八·苻融〉，頁 304。案：司馬光《資治通鑑·晉記·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亦載：「（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德經立戒篇之辭。〕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會，要也，言大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台北：廣文書局，1967年6月），頁 3304。

<sup>210</sup> 見房玄齡：《晉書·苻堅載記下》，頁 2913。

建康城，遂使荆、楚、揚、越取代中州，一躍成爲漢族衣冠禮樂文物正統之所在地。此世變對於留處三秦河洛，向來視南疆爲王化不霑之地的北方父老而言，心理狀態十分複雜，甚至帶有些許歷史傷感！因此，當桓溫率領南方王師北伐苻秦，兵進關中，抵達霸上之時，百姓的心情顯得相當激動。據《晉書》記載：

溫進至霸上，……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sup>211</sup>

從文義上看來，長安百姓在前秦的統治之下分明是安居樂業，然而他們心理上卻極爲渴慕「王師北征」，驅除胡虜。因此，當官兵行軍至霸上時，長安百姓紛紛備酒肉相迎於道旁，感動涕零，情緒莫名激昂，其欣喜之情蓋發自漢族血緣認同的心理及寄於左衽的無奈。對此，桓溫的態度又必須看到《晉書》的另一段記載：

溫入關，(王)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

212

顯然北方漢民很快就發現桓溫的存心，於是對桓溫的態度轉而冷漠，甚至根本不以為然！面對桓溫的疑惑，王猛的回答以及桓溫的無言以對，在在揭露了桓溫根本無心北方大業而意在江左的一個事實。<sup>213</sup>雖說桓溫在攻克洛陽時還曾經上疏陳

---

<sup>211</sup> 見房玄齡：《晉書·桓溫傳》，頁 2571。

<sup>212</sup> 見房玄齡：《晉書·苻堅載記·附王猛傳》，頁 2930。

<sup>213</sup> 此涉東晉內部的政爭問題，請參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頁 141-151。又前燕謀臣申胤便曾分析預料桓溫必然無功：「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

請還都：

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飆陵振無外，……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sup>214</sup>

王夫之曾對此評議曰：「桓溫請遷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慕容恪方遣呂護攻雒，溫所遣援者，舟師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鎮雒，然後請遷都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誰信之？為此言也，特以試朝廷所以答之者。」<sup>215</sup>「北伐中原」向為東晉之主要訴求，更是維護本身華夏正統旗幟的口號，然而大張旗鼓，屢興義軍的一些所謂北伐之士，卻並非皆如祖逖、殷浩等人想法相同，願意不計個人利害，但求克復神州。自晉室南渡以來，許多北伐主事者只是想藉由操作「北伐」議題去樹立威信，提升個人威望，增益門戶權勢，以左右江左的政治生態，甚至謀取皇位。<sup>216</sup>如王敦自荊州起兵叛亂，曾「詐稱北伐」<sup>217</sup>；長期致力中原，以

---

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二·晉紀二十四·晉海西公太和四年下》，頁 3216。

<sup>214</sup> 見房玄齡：《晉書·桓溫傳》，頁 2573-2574。

<sup>215</sup> 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合刊》，上冊（台北：里仁書局，1985年2月），頁 429。

<sup>216</sup> 周一良：〈東晉以後的政權嬗代之特徵〉，《周一良集·第二卷·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南齊書札記》，頁 405-417。

北伐爲謀的陶侃，在都督八州之後，竟也開始培植實力而有「窺窬之志」<sup>218</sup>；後來庾亮、庾翼兄弟在荊州倡言北伐，開復中原，其目的則在於鞏固上游分陝勢力，以徐圖朝廷。<sup>219</sup>「北伐」最終淪爲政治野心分子爭權奪利的口號，漸漸地北方士民對於南方朝廷也就失望大於期望。

此外，南方士民在時移事遷及現實遷就之下，也逐漸習慣偏安江左的心態。史書上說南方百姓面對殷浩、桓溫、謝尚、荀羨等人「連年征伐」，已有「愁怨」之心。<sup>220</sup>桓溫疏請移都洛陽之際，孫綽就曾上疏駁議其非，文中表達了當時江左人士對於恢復中原的若干想法：

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踈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sup>221</sup>

相應於孫綽所言，范寧上陳時政時亦云：

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sup>222</sup>

---

<sup>217</sup> 見房玄齡：《晉書·宗室傳》，頁 1105。

<sup>218</sup> 見房玄齡：《晉書·陶侃傳》，頁 1779。

<sup>219</sup> 參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 86-112。

<sup>220</sup> 參見房玄齡：《晉書·五行志上》，頁 816。

<sup>221</sup> 見房玄齡：《晉書·孫綽傳》，頁 1545-1546。

<sup>222</sup> 見房玄齡：《晉書·范寧傳》，頁 1986。

因此，即便不提江東本地人士之感受，就算是南來北人也是渡江日久，生活日安、風俗日染，再加上田產家業及祖先壟墳之考量，其情誠如《晉書·桓溫傳》所云：「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sup>223</sup>是以王羲之亦曾兩度勸阻殷浩北伐：

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sup>224</sup>

王羲之勸殷浩放棄保淮，退守長江，專心治理江左政務，不要再爲了北伐軍需無謂耗損，無疑是要殷浩放棄北伐事業，以符合江南百姓真正的需求。同時，王羲之懼於殷浩執迷不悟，還上書當時主政的司馬道子，促其遏阻殷浩北伐：

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sup>225</sup>

---

<sup>223</sup> 見房玄齡：《晉書·桓溫傳》，頁 2573。

<sup>224</sup> 見房玄齡：《晉書·王羲之傳》，頁 2094-2095。

<sup>225</sup> 見房玄齡：《晉書·王羲之傳》，頁 2096。

王羲之的想法，多少能夠反映當時南方人士的安土樂業的心理，畢竟北伐中原始終存有風險，還不如鞏固江左偏安局面為佳。

南方朝野對於北伐的態度既是如此猶疑，北方士民的期望自然每下愈況，以致於不再抱任何的期望。如果再參照《宋書·劉義真傳》的記載，就更能進一步瞭解北方士民對南方晉廷的失望之情。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劉裕當時的身分還是東晉臣子，其帥領南方大軍北征姚泓，適值平定關中之際，卻突然接獲朝廷傳來權臣劉穆之亡故的消息，於是劉裕不顧關中父老的勸留，毅然火速回到建康，以期安定朝政。<sup>226</sup>而就在劉裕即將還朝之際，但見：

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為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sup>227</sup>

其時事隔永嘉失御，晉祚南遷（317）已有百年之久。然在此一百年間，除了苻堅朝曾有短暫的安定期，北方地區並未真正穩定下來，依舊戎寇鼎沸，政權更迭不休。北方百姓長期在心理上缺乏政治、文化的認同感及歸屬感，是以唯有引頸企盼南師北討，整飭二都衣冠。只是好不容易盼到王師到來，正收復關中之際，卻又在突如其來的政治事件中發現南方主事者並未有長期經營北土的決心，其悵然之情推想可知。最諷刺的是，劉裕進據洛陽時也曾有過謁陵思遠之舉，行徑竟與當年桓溫車轍一致。傅亮〈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云：

---

<sup>226</sup> 關於劉裕的心態，當時大夏國的謀臣王買德分析得極為透徹：「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乃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晉紀四十·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頁 3715。

<sup>227</sup> 見沈約：《宋書·劉義真傳》，頁 1634。

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湍急，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奠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廬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sup>228</sup>

南方政客長期將「北伐」作為謀取個人政治私利的工具，假意周旋於南北之間，其虛與委蛇的態度，不斷消磨京洛父老對於南方的民族情感。反觀五胡諸國經營北方逐步推行漢化，摒棄戎俗，同化於華風，亦漸漸獲得北方漢民的肯定，終於南北漢人血脈之情漸疏。

五胡入主中原後，雖然擁有政治上的支配力，但是由於文化水平不高，故不得不同化於中國，漢化活動也一直持續不斷地在北方胡漢社會中進行著，終於在北魏孝文帝朝達到頂峰，產生能與南方文化分庭抗禮的洛陽衣冠。伴此而來的現象是五胡諸主居然多有雅好漢文化者，<sup>229</sup>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曾根據《晉書·載記》整理指出「僭偽諸君有文學」<sup>230</sup>，可以發現胡族上層精英多受過良好的漢

---

<sup>228</sup> 見：《文選》李善注，頁 964。

<sup>229</sup> 參見劉國石：〈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貴族的漢文化修養〉，《社會科學戰線·中國古代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頁 125-129。

<sup>230</sup> 原文如下：「晉載記諸僭偽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有文學。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左是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為君子所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沈精積思，不捨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岳質通疑滯。既即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間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即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雋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氏人，乃求學耶？』及長，博學多才藝。既即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週、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登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為太子時，與范昷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嘗

文化教育，無怪諸胡進入中原以後，很快地能夠從上而下推行各種漢化政策，以應付實際執政上的需要。今將五胡諸國主要的漢化措施舉要，表列如下：<sup>231</sup>

種族	國名	漢化政策舉要
匈奴	前趙	劉曜立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
羯	後趙	石勒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石勒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石勒初置大小學博士，石虎復置國子博士助教。
鮮卑	前燕	慕容廆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東脩受業焉。 慕容皝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
	南燕	慕容德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

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聽政之暇，輒引龔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王尚、段章以儒術，胡義週、夏侯稚以文學，皆嘗遊集。淳于岐疾，興親往問疾，拜於床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群史，曉天文。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為答書，默誦之。召劉使至前，口授舍人為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為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台北：廣文書局，1992年8月），頁128-129。

<sup>231</sup> 表格參見薩孟武：〈晉隋之間的南北形勢〉，收錄於韓復智編：《中國史論集》（中冊）（台北：茂昌圖書公司，1997年8月），頁1269-1326。

	南涼	祠部郎中吏曷曰，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禿髮利狐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氏	前秦	苻健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苻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 苻堅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尊焉。 苻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
羌族	後秦	羌萇立太學，禮先賢之後。姚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 天水姜龕東平淳于歧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姚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屬身，往來出入，勿拘當限，於是學者咸勤，儒風盛焉。

我們更進一步舉例，看胡人政權與北方漢民互動的情形。

前燕慕容廆在中原動盪的情況下，刑政修明，虛懷引納，使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又特別設立橋郡以統流人，如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使漢民有歸鄉之感，也帶動農工商業的發展。<sup>232</sup>甚至從漢士中推舉賢才，委以庶政，如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奔、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

<sup>232</sup> 參見劉學鈞：《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年10月），頁23。

史書云慕容廆主政期間：「路有頌聲，禮讓興矣」<sup>233</sup>。

前秦苻堅時代更是無庸贅言，其對於漢文化的衷情在五胡君主中絕無僅有，他以漢文化傳承為己任，期望自己成為湯、武聖君，對於漢人宰相王猛更是言聽計從，是以幾乎完全統一北方，與東晉形成真正的南北對峙。苻堅在位期間「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sup>234</sup>史書記載當時苻堅朝的情況是「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sup>235</sup>此雖難免溢美，但至少可以說明苻堅朝的國勢昌盛。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北方漢民會逐漸選擇服膺胡人政權，到了北魏洛陽時期甚至有許多漢士擺落夷夏分別，轉而認同胡人政權而與南方形成無關胡漢糾葛的南北地域文化之爭。

倘能再留心移民歷史，就更能清楚看見北方漢民對於南北認同態度的轉變。東晉百年間北方人士大小規模南遷從未間斷，可是到了北魏道武帝統一大部分的北方領土之後，北人南遷的情形變的很少，甚至到了劉宋立國之時，已不見所謂的移民潮，<sup>236</sup>爾後蕭梁五十餘年，史籍更無移民之相關記載。<sup>237</sup>周一良認為之所以會有這種移民現象，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北人為了躲避連年兵燹，另一方面則完全是基於不願服屬胡族的心理，所以才會在東晉時期不斷地喬遷江南。而迨宋齊之世，移民潮之所以逐漸停止則是由於北方政治漸趨安定，再加上昔日民族意識日益消磨，苟非被迫，必不肯再離鄉背井，南徙江東。<sup>238</sup>

<sup>233</sup> 參見房玄齡：《晉書·慕容廆載記》，頁 2806。

<sup>234</sup> 參見房玄齡：《晉書·苻堅載記》，頁 2885。

<sup>235</sup> 參見房玄齡：《晉書·苻堅載記》，頁 2895。

<sup>236</sup> 自永嘉喪亂以後到劉宋（307~477）共計一百七十年間，北方人往南遷徙者多達九十餘萬人。參見高敏主編：《中國經濟通史·魏晉南北朝經濟卷上》（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8月），頁 130。

<sup>237</sup>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收錄於氏著：《周一良集》頁 38-48。

<sup>238</sup>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出處同前註，頁 45。

周氏的意見大致基於兩個層面，一是政治、經濟、民生的考量；一是胡、漢民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除此之外，應該可以再進一步考慮「文化認同」所帶來的「政治認同」，或許這一點才是真正打破胡漢百年藩籬，消解民族摩擦的最關鍵因素。唯有注意到這一點，才能進一步解釋為什麼北魏崛起之後會止住先前的移民現象，轉而變成南方的衣冠人士、朝廷文官以及各階層士民開始往北發展，投降、移民北朝。<sup>239</sup>

歷史發展進入南北朝以後，南朝幾代的政治環境穩定性相對不如北朝，然而若非北朝的文化號召力已經到達一定強度，具有足夠的吸引力，甚至在法理上恢復繼承了中原文化正統，恐怕也難以說服南方人士折節依附。當然，談北朝的文化號召力不應忽略十六國在典章制度上的努力，諸如效祀、藉田、官制、朝儀、律令、崇儒、興學等等，<sup>240</sup>這些無疑是北魏漢化的先聲。

#### 第四節 小結

傳說舜帝曾彈奏五絃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sup>241</sup>這是一幅中國上古時代的理想國圖像，南風吹來，可以陶養人民性情、使人民殷富，不僅南方人獨有，北方人也可以享受，絕不涉及任何意識紛爭。然而，隨著歷史演進，逐漸地分東西、人分南北，地域認同感與文化排他性聯袂生成，包容與尊重難以為繼，於是「南」、「北」地域文化之間形成一種莫名的隔閡。至少在戰國時代，中原人士就已經對南方人產生鄙視心理，如《孟子·滕文公上》所云：「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

---

<sup>239</sup> 關於南北朝降人、移民之問題可參見蔡幸娟：《南北朝降人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鄭欽仁先生指導，1976年6月）。

<sup>240</sup> 參見劉國石、王瑋平：〈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典章制度的漢化〉，《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3期（2004年6月），頁27-31。

<sup>241</sup> 見：《後漢書·仲長統傳》「章懷太子李賢注」引《家語》，頁1645。

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又同篇：「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完全流露出南方蠻民不曉先王禮樂的北方文化本位思維，<sup>242</sup>隨之而來的就是地域主義競爭心理了。

本章以時為軸考論周、秦、兩漢、三國、兩晉及十六國的地域文化之爭，探討南北朝以前地域文化競爭結構由「東西向」轉成「南北向」的歷史脈絡。周、秦、兩漢主要是山西和山東文化的爭執，漢末三國則逐漸演化成南北人才的對抗，永嘉之亂以後的十六國時期則於原有的衝突元素中摻進夷夏之辨，於是種族、血緣、政治等因素混為一談，致使南北朝文化之爭必須辯證的問題愈來愈多、愈來愈複雜。而從歷代興衰中也可看見地方意識的巨大作用力，因著尊重、包容文化差異而得國得民者有之；未能留心地域文化衝突而招致禍端者亦有之。

殷鑑歷史，「統一」的國家未必會是「統合」的國家，<sup>243</sup>尤其對於幅員遼闊的中國，地域之間的統合更是極具難度，因此，統治者的文化態度就顯得更加重要！秦朝雖然統一六國疆域，卻未能進一步統合六國文化；東漢雖然重新恢復新莽以來的政治社會秩序，卻忽略國土開發的東西平衡；西晉雖然能夠結束國土分裂，可是無法消解南北分化的離心力量。可見統治權取得之後的文化號召力比任何的政治控制力都來得更具效力。故知唯有從上到下培養文化保護意識，在發揚自身文化的同時又能包容異己，尊重彼此的文化差異性，才能使國家進入長治久安，漢、唐盛世正是由此開啓！

---

<sup>242</sup> 參見陳序經：〈歷史上的南北文化觀〉，《嶺南學報》（1934年第三卷第三期），頁7-9。

<sup>243</sup> 「統合」（national integration）是指消弭構成國家的各部門——包括區域、民族、階級——之間的差異而形成一個向心力高、凝聚力強的政治共同體。參見蕭啓慶：〈元朝的統一與統合一——以漢地、江南為中心〉，收錄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2。